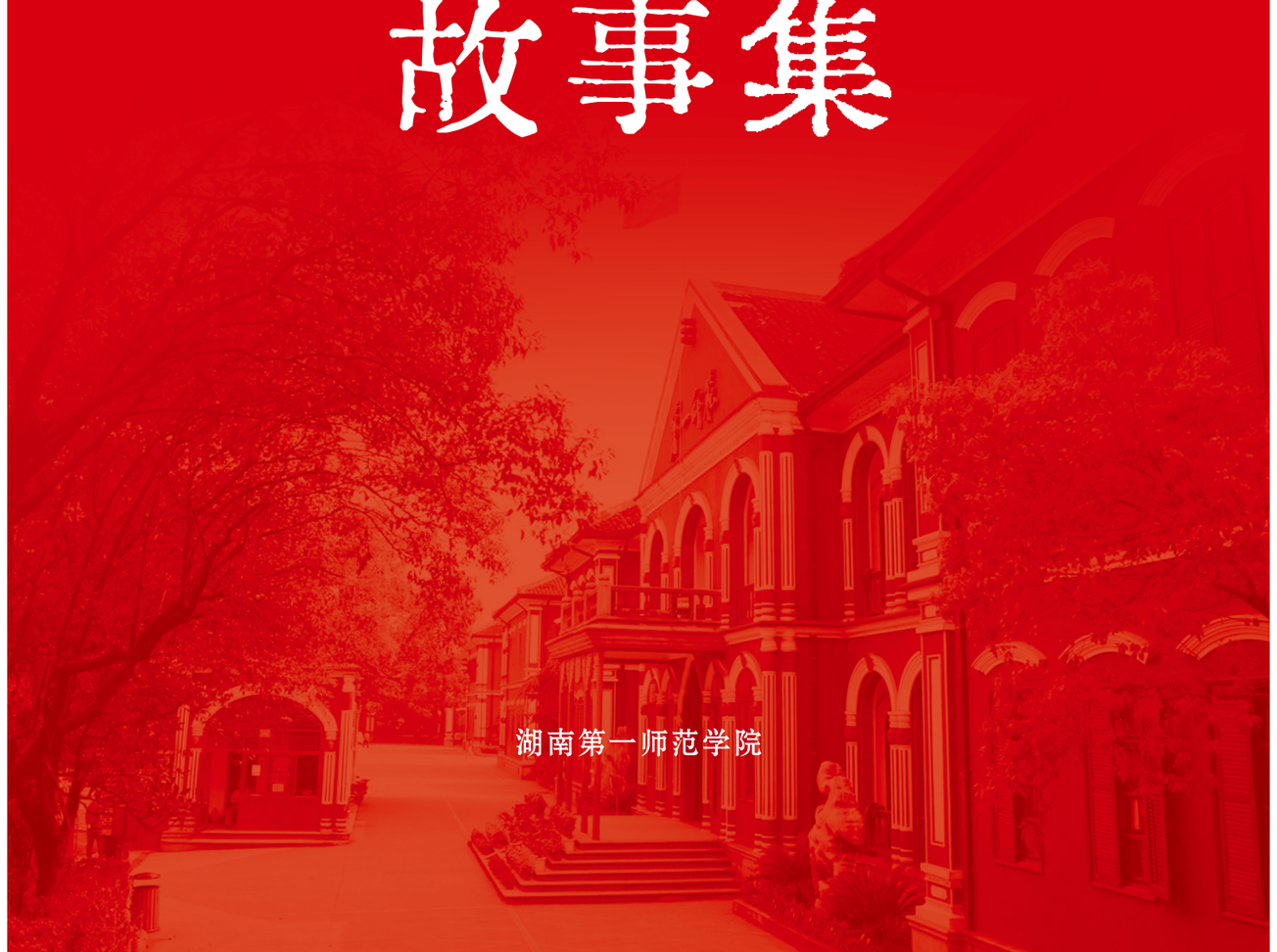
第一師範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红色一师

HONGSEYISHIGUSHIJI

故事集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润之篇】

“不动笔墨不读书”——《讲堂录》.....1
《蝶恋花·答李淑一》.....2
《虞美人·枕上》——一曲烽火岁月的爱情咏叹.....3
俄罗斯研究会.....4
烽火中的时代强音——《湘江评论》《新湖南》.....5
高谊贯于日月 精诚动于鬼神——毛泽东写给白浪滔天的信.....6
湖南自治 最后的“觉醒“——从夭折的“湖南共和国”说起.....7
积学贵有恒——毛泽东为萧子升学习笔记《一切入一》题写的序言.....8
伦理学原理批注——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9
毛泽东与《新青年》.....10
毛泽东与五四运动——湖南学生联合会.....11
毛泽东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信.....12
民本主义教育方针之“人物互选”.....13
明耻篇.....14
驱张运动（平民通讯社）.....15
青年毛泽东的“北漂”生涯.....16
屈子当年赋楚骚——毛泽东手抄《离骚经》.....17
以民为本，取信于民——《商鞅徙木立信论》.....18
少年多壮志——《七绝·咏蛙》.....19
伟人之初：孩儿立志出乡关.....20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21
一封托孤信.....22
与天奋斗 “奋斗”诗.....23
战以图存——毛泽东1916年7月25日写给萧子升的信.....24
《送纵宇一郎之东行》赏析.....25
真理的曙光——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26
征友启示.....27
自信人生二百年《七古·残句》.....28

“不动笔墨不读书”——《讲堂录》

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的第三展厅，陈列着一份听课笔记，这是毛泽东1914年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期修身和国文两门科目的听课笔记。有记录有点评，内容丰富，字迹工整，现仅存47页，弥足珍贵。这份字迹繁密工整的课堂笔记也见证了毛泽东独特的读书方法“不动笔墨不读书”。

1913年春天，19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湖南第四师范，在此后五年半的时间里，他写的大量的日记和听课笔记、书报阅读札记。毕业后，他把这批手稿存在韶山家中，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重金悬赏缉拿毛泽东，他家中的族人不得不将装了一麻袋的听课笔记和资料给烧掉，只有一部《讲堂录》保存了下来。2014年10月，经中央档案馆首次授权，这部作品的手迹全文首次以图书单品的形式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原件四十七页，九十四面。笔记用的是直书九行纸本，前十一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三十六页冠名《讲堂录》，主要内容是听课笔记，主要包括身课和国文课的记录，也有个别算术课笔记，以及一些读书札记。其中修身课记录内容，是青年毛泽东听杨昌济讲课时的记录；而国文课记录的内容，是听袁仲谦讲国文课的记录。毛泽东非常赞赏徐特立老师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他认为凡是读书，必要写心得、做笔记，这是学习的一个好办法。这一万多字的手稿，一律用兰亭体小楷毛笔字在竖行毛边纸上一丝不苟写成。今天，打开这100多年前，20岁的毛泽东师范生的作业，扑面而来的是历史的文化气息，一个勤奋好学、孜孜以求的上进青年形象向我们走来。

在一师学习期间，青年毛泽东受到杨昌济老师的教诲最多。杨先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的修身伦理课第一节就是“立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首先要确立自己的坚定信仰，不可随便抛弃自己的主义。在他的感召下，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录到“理想者，事实之母也”物质之我是小我，精神之我才是大我。树立“理想”，就是要追求大我，“实意做事，真心求学”。毛泽东对杨先生的课听得尤其认真，单就杨先生讲的《西洋伦理学史》就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七大本。而杨先生讲的《伦理学原理》，原书仅10万多字，毛泽东却认真地写了12000多字的批语。全书还逐字逐句都加上圈点、双杆、三角、叉等符号。他认为杨先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润之，你的文风很犀利，很有热情，很像新闻记者手笔，应该是受到了梁启超的‘新民体’文风的影响吧”。长廊里，一位大胡子老师正在和毛泽东谈话，这是国文老师袁仲谦。“是啊，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梁任公的文章是极好的。”对这位“袁大胡子”，毛泽东一直很尊敬，但对于其古板的教学方法，一直有些保留意见。袁仲谦若有所思，耐心的说：“你读书不少，但内容庞杂，良莠并蓄，不利于消化、吸收。应该多去研读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韩愈的文章”。随后，他毛泽东列了一个必读书单，让毛泽东将书单上的书读完，讲完了读书，袁仲谦又讲写作。毛泽东听了后沉吟半晌，随后说“先生，我先前不知事理，悔不该冲撞了您”他买来一部《昌黎先生集》，晨诵午习，晚上还在宿舍旁的走廊灯下默读。他逐渐了解韩愈文章的精髓，随后喜爱上了韩愈的文章。《讲堂录》中多次抄录其中的句子、段落，并作出很多批注和见解。除了韩愈的文章，《讲堂录》中，单单提到的古文书籍就包括《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吴越春秋》、《农书》、《昭明文选》、《资治通鉴》、《朱子文集》等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这和袁仲谦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讲堂录》非常推崇实干精神和实干家，“古者为学，重在行事”，他多处记载了拿破仑、恺撒与福泽谕吉等历史人物。其中较为集中抄录的，是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的言论。他对曾国藩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青年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即是办事之人，也是传教之人，是少有的精通两条路的历史人物。他读了很多关于曾国藩的文章，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其中他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现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收藏有这本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扉页均有青年毛泽东亲自手书写的大字“咏芝珍藏”。翻开每本书，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批注和圈圈点点，让人感叹青年毛泽东看书之认真仔细。

《讲堂录》里，还推崇读无字之书的学习方法。“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毕业前一年的暑假，23岁的毛泽东，邀请同学萧子升一起出门“打秋风”。“打秋风”是湖湘古老的习俗，穷书生可以一分钱不花的去“游学”。两人徒步九百余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做社会调查，他们仅带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通过给学校、店铺、庙宇和居民写对联、作诗文或提供其他服务来解决食宿和路费，历时一个多月，广泛接触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寺庙方丈各色人等。1918年春，他又和蔡

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斯诺这样记述了毛泽东的回忆：“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不动笔墨不读书”。从这部笔记里，我们看到一个勤学苦思、有宏大抱负的青年。这时候的毛泽东纵览古今，网罗各家，兼收并蓄。由于他善于独立思考，批判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因此凡读过的书、接触过的思想观点，都能消化批判而有切实的收获。而这种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动笔，认真批注的读书方法，伴随着毛泽东走过了一生，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蝶恋花·答李淑一》

《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是毛泽东写于1957年5月11日。这首词不仅是抒发悼念情感之作，寄托了毛泽东对夫人杨开慧烈士和亲密战友柳直荀烈士的无限深情，也表达出一代伟人对烈士遗孀和昔日老友的关爱。他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通过奇特而瑰丽的联想和想象，以最精炼的语言和最深厚的感情，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深切悼念和崇高敬意，歌颂了革命先烈生死不渝的革命情怀，激励广大人民捍卫革命成果，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李淑一何许人也？她1901年出身在湖南的一个书香门第。入读福湘女中时，与杨开慧成为同窗好友。柳直荀与毛泽东则是在长沙读书时相识，并在共同从事革命活动中结为亲密战友。后来，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帮助下，由杨开慧当“红娘”，1924年10月30日，柳直荀与李淑一结为伉俪。1927年5月21日(当晚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柳直荀匆匆回家吃过饭后，告别妻子和一对儿女，赶到省农民协会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岂料这一别竟成永诀。后来李淑一一直以教书为生，抚育儿女。

一九五七年的春节，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谈她读了毛诗的感想。毛泽东五月十一日回信，“淑一同志：惠书收到了。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正式发表时，词题改为“赠李淑一”，后又改为“答李淑一”。

当李淑一收到这封信件时，她步履轻盈地迈进长沙市第二女中初三的教室，声音有些发颤地对学生们说：“毛主席给我写信了！”霎时间，学生们都愣住了，李老师从大信封中抽出一个小信封，左下方是遒劲、潇洒的三个字：毛泽东！在学生们的掌声中，李老师饱含激情地朗诵了毛泽东主席赠给她的《蝶恋花·游仙》：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50多颗火热的心同为老师而兴奋，50多双稚嫩的手同向老师鼓掌。此情此景，不禁使人联想到1933年，李淑一听说丈夫柳直荀牺牲后，结想成梦，和泪填了一首《菩萨蛮·惊梦》词：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想到这里，她就经不住眼泪慢慢从她眼角她更是抑不住内心的酸楚而痛哭流涕，满堂几十个小姑娘也由于受到老师的强烈感染而整整哭了一节课。

正是这首词，历经数十年风雨，李淑一于1957年1月寄给毛泽东主席请他指正；也正是这首词，令毛泽东主席“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于同年5月11日，挥笔写下感天地的词章《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寄托了毛泽东对夫人杨开慧烈士和亲密战友柳直荀烈士的无限深情，也表达出一代伟人对烈士遗孀和昔日老友的关爱。

李淑一生在讲台上辛勤耕耘浇桃李，呕心沥血培育鲜花，为社会为国家培养了“满天下”的有用之材。她因毛泽东的光辉词作《蝶恋花》而蜚声中外，但她没有因此而居“词”自傲、醉入“花”丛，而是在极其平凡的人民教师的岗位上，如蜡烛般献出光和热。这就是李淑一——被毛泽东主席尊称为“君”、被湖南人民尊称为“李老师”、被北京人尊称为“李奶奶”的李淑一。

1997年6月13日凌晨，李淑一走完了她俯仰无愧的一生，在京安然仙逝。

《虞美人·枕上》——一曲烽火岁月的爱情咏叹

毛泽东曾这样总结式地评价自己的诗词：“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确，我们能从现在留存的绝大多数毛泽东诗词感受到豪放之气，但其中也不乏婉约之作，甚至多次落“泪”。写于1921年的《虞美人·枕上》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也是毛泽东生平创作的第一首词作。

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词是毛泽东于1921年写给新婚妻子杨开慧的一首思念之作。杨开慧是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的女儿，自幼师承家学，后进入福湘女中等校求学，知书达礼，聪慧娴淑。她与毛泽东因为杨昌济先生的缘故相识，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相知。杨开慧极为仰慕这位父亲心中的“资质俊秀”的“海内人才”，而毛泽东对这位比自己小8岁的小师妹也是关爱有加。

1918年夏，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经杨昌济先生介绍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此时的杨开慧也随父亲在北京生活。25岁的毛泽东与18岁的杨开慧基于共同的人生理想彼此心心相印，爱情的种子在初春的北京破土萌芽。

1920年1月，杨昌济先生身染重病，不幸在北京去世。毛泽东协助杨家料理了先生的后事，并安排灵柩南下事宜，将先生安葬回板仓。就在1920年冬，杨开慧没有媒妁之言、没有花轿、没有喜宴等俗举，在哥哥的陪同下，背着简单的包裹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与在此担任主事的毛泽东结为革命伴侣。据毛泽东的表弟文东仙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和杨开慧鞠了一躬就结婚了”。

“以前有些先生们讲，要来闹场合，这次结婚都没让他们晓得。毛主席讲：今天我和杨开慧结婚，自己家里的人都接了，外婆家有你（文东仙）代表。”

关于毛泽东与杨开慧的这段“新式”婚姻佳话，是当时这两位年轻人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的生动体现。早在1920年11月26日，毛泽东写给罗学瓒的信中就曾写道：

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

此时的毛泽东公开身份是第一师范的教员，他在革新教育的同时，已经将目光转向风云变幻的时局，并着手开展了一系列建党、建团的早期革命实践活动。婚后的杨开慧成为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并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位女党员，夫妻携手并肩傲立于时代潮头，

1921年春夏间，毛泽东离开妻子前往洞庭湖沿岸开展社会调查。旅途中一个夜晚，年轻的毛泽东深深地思念和挂牵着家中的杨开慧，整晚辗转难眠，漫漫长夜，无处话凄凉，索性“披衣起坐”，写下了这首凄清缠绵的《虞美人·枕上》。

毛泽东这首词选用了经典的《虞美人》词牌名，一改当时激情飞扬的豪放文风，极为罕见地采用颇具李煜、柳永风格的婉约词风，语言平实，却字字发自肺腑，句句情真意切。

词的上阙从“愁”字入手，写尽离愁之苦、思念之切，与李煜的《虞美人》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异曲同工之妙。下阙以“泪”字收笔，这是毛泽东一生仅有的三首含有“泪”的诗词之一。多情未必真豪杰，此时的毛泽东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他是革命者，但也是普通男儿，能在茫茫众生中遇到志同道合、心灵相契、情投意合的伴侣，心中念、笔端情凝成眼中泪又何尝不是人之常情、真情流露呢？

可想而知，杨开慧收到丈夫这首词时的甜蜜与感动。出生于书香门第殷实家庭的杨开慧，义无反顾地选择与当时可以说“身无分文”的毛泽东结婚，选择的是毛泽东的才华横溢和志存高远，同时也选择了作为一名革命者妻子所面临的颠沛流离，甚至流血牺牲。她从不后悔，从不畏惧。可在聚少离多的日子里，杨开慧辗转难眠过多少个夜晚？又流淌过多少思念和牵挂的眼泪？此刻，当这样一首浸透着毛泽东款款深情的词作出现在杨开慧面前的时候，所有的辛劳、担忧甚至曾面临的凶险瞬间烟消云散，他们彼此心相印、手相牵，在革命的风浪中同呼吸、共命运、齐奋斗。杨开慧曾这样描绘过对毛泽东的感情：

“我是真的爱他呀！”

“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

“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杨开慧将这样一份甜蜜也毫无保留地与闺蜜李淑一进行了分享，据李淑一解放后回忆说：

共同的革命志向、共同的斗争生活使他们（毛泽东、杨开慧）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开慧经常向我谈起毛泽东的为人品质，连恋爱中的“秘密”也告诉我。有一次，我们在流芳岭下散步，开慧告诉我她收到了毛泽东赠送给她的一首词。我问什么内容，她毫无保留地念给我听，并让我看了词稿。

也正因为闺蜜之间的这次分享，才得以让这首《虞美人·枕上》保存了下来。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识字岭被国民党残忍杀害，年仅29岁。临刑前，杨开慧斩钉截铁地拒绝敌人的劝降，大义凛然地表示：“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而远在井冈山的毛泽东直到一个多月后，才从报纸上得知这一噩耗。在毛泽东的心中，悲伤与歉疚如山崩地裂：杨开慧是何等聪慧的女子？原本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可自从与自己结婚以后，物质上拮据贫乏，精神上担惊受怕，最后还因为自己如此壮烈地牺牲。他怀着悲痛的心情，提笔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而毛泽东所不知道的是，杨开慧在被捕前，以一个革命者的敏感，早已预料到危险即将来临。她将党的机密文件和自己的珍贵手稿一部分予以烧毁，一部分封存在板仓旧居的墙缝里。这些封存的文献资料直到1986年重修板仓旧居的时候，才得以重见天日。而这时距离杨开慧牺牲已经整整56年，距离毛主席逝世也已经过去了10年。

这首《虞美人·枕上》当时并没有被封存在墙缝里，那又是怎样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呢？

1957年，李淑一在拜读了《诗刊》上毛主席发表的诗词十八首后，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当中特意提到杨开慧当年给她看过《虞美人·枕上》一事，并附上了自己根据回忆抄录下来的词稿，恳请毛主席手书一份送给她，当做缅怀。

李淑一的这封信勾起了毛主席对过往的无限追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在毛主席的心中，杨开慧永远是他心中“最亲爱的夫人”，也是他不忍去触碰的伤痛。他在给李淑一的回信中，没有抄录这首旧词送给李淑一，而是饱蘸深情地重新写了一首新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当有人问及形容女子为何用“骄”不用“娇”时，毛主席回答说：“女子为革命丧其元，焉能不骄”！“骄杨”，这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最深切怀念和最崇高敬意。

而那首《虞美人·枕上》，毛主席是真的“不愿意”抄录吗？据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这首词毛主席在词稿上反复修改了多次，生前不愿意公开发表，而是自己独自珍藏的。或许在毛主席的心中，这只是属于他与杨开慧的血色浪漫，不愿意被外人所知吧。这首词直到1983年才第一次在《解放军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有所提及。1994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101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这首词予以纪念。此时距离毛主席逝世已近20年，距离杨开慧牺牲更是过去了60多年了。

然而，随着这首词作的发表，毛泽东与杨开慧这曲烽火岁月的爱情咏叹也被世人所知晓，所震撼，所敬仰。多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那些枪林弹雨的征途中，正是无数像毛泽东与杨开慧一样革命夫妻，近则小家，远则天下，一远一近间，构筑起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也耸立起了家国天下的不朽丰碑。

俄罗斯研究会

俄罗斯研究会是20世纪20年代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湖南籍爱国知识分子，发起并组建的一个革命团体，如毛泽东、何叔衡等，这对湖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具有深远影响，很多湖南青年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后并被推荐到俄留学，从而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如任弼时、肖劲光等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深深震撼了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他们开始关注俄国的革命形势，渴望寻找到一条改变中国的成功道路。

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来到北京，为了维持生计，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一职，工作期间，毛泽东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并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同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聆听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演说。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很快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李大钊在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和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废除，但是对华友好宣言却被北洋政府拖延不予发布,到后来1920年才经媒体发布，国人迅速对苏俄产生好感。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迅速传播也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研究邻国俄国的革命经验,湖南的毛泽东对此尤为关注。

1920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送别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子后返回长沙,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了文化书社，开始从文化传播层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营的书刊也大多与此有关，如《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一定会来到，因为“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毛泽东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后来成立的俄罗斯研究会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从实践层面推动青年们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情况，并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武装革命的情况开展研究。

俄国革命的成功激发了国人学习俄国革命经验的热情，毛泽东等湘籍青年走在了

时代的前列。为扩大国人对苏俄国情的了解，于1920年8月22日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同时在当日长沙《大公报》刊登启示“以俄国事情急待研究,拟发起俄罗斯研究会,定于本日(星期日)午后三时，约集各机关关心外政之人,商议一切进行方法，假长沙县知事公署为会场。”当日到会约有十余人。彭璜从苏俄内外政策看出“他的主义是反对强权，提倡人道，主张民族自治，不惜牺牲最少数人，以来收回最大多数固有的幸福。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创造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而这正是中国青年所追求的目标。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文化书社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为顺利开展工作，俄罗斯研究会制定了章程“(一)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有三人以上之介绍,得为本会会员。(二)本会会务：一、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三)本会会费由会员自由捐助。(四)会内设书记庶务干事各一人。”大会同时认为“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会议公推举姜济寰为总务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并驻会接洽一切。会议还决定派张丕宗赴京转赴俄国，郭开第在船山学社办俄文班，还讨论发行俄罗斯丛刊问题”。

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之后迅速开展了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定期举行讨论会与报告会，介绍俄国革命进展情况，二是发动并组织留俄勤工俭学活动。任弼时即使最早进入俄罗斯研究会，并被推荐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

百年回首，慷慨依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创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唤起了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和仁人志士聚集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这些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为了心中的信仰殚精竭虑、勇往奋进，甚至不惜断头流血，开启了中国由屈辱、落后向繁荣、富强的伟大变革。时至今日，真理永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迎接新征程，谱写新篇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更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学而知，由知而信，由信而行”的精神，做马克思主义的勤奋学习者、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

烽火中的时代强音——《湘江评论》《新湖南》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并席卷全国.在这场大潮中，无数热血青年争先涌上街头，他们向腐朽的旧社会、向沉睡的中国发出声声怒吼。

此时，结束北京之旅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刚刚成为修业小学的一名教员。看到此情此景，毛泽东深感震撼，他迫切地希望能投身其中，但通过什么方式能让自己的所思所想让更多人听到呢？毛泽东几经思索之后，他决定要办报。在与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等人商议后， 1919年7月14日，在“五四”办报的热潮中，青年毛主席在长沙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修业学校南楼一层的一间房间便成了《湘江评论》的编辑部。

办报的过程却不那么顺利，报纸即将出版的前几天，面临着稿子收不齐的问题，为了不耽搁《湘江评论》的顺利发刊，毛泽东只好自己动笔赶写。毛泽东白天在修业学校教书，晚上还要写稿、编稿。有一次，朋友易礼容去看望他，无意中揭开蚊帐，不料惊动了几十只臭虫，在用做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饱尝了《湘江评论》主编的血。文章写好了，人手不够，毛泽东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自己到街上去叫卖。就在这种窘困生活中，《湘江评论》得以面世，它以"文风新颖，通俗易懂，笔调尖锐，气势磅礴，切中封建统治的要害"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思想浪潮。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这样写道“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这声“湘江边的怒吼”响彻大地，穿透历史，划破星空，今天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毛泽东还写出了一篇长篇政论《民众的大联合》，首次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号召人民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还热情赞颂了十月革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这篇文章在《湘江评论》上连载后，上海、北京、成都等一些报刊也相继转载或推荐。《湘江评论》在全国的影响得以进一步扩大，《湘江评论》创刊号印2000份，当天销售一空，后加印2000份。从第二期改印5000份，深受读者欢迎。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称它为“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每周评论》评价它“眼光

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是现今最重要的文字”。北京《晨报》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介绍它“著述选材，皆及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

由于《湘江评论》反帝反封建的目标明确，而且文风新颖，通俗易懂，笔调尖锐，切中封建统治的要害，因而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在1919年8月中旬第五期刚刚印出，还未发行，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以“异端邪说”的罪名给查封了。《湘江评论》从创办到被查封，虽然只出版了四号正刊和一号临时增刊，前后只存在一个多月时间，但被公认为是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影响十分深远。

《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毛泽东的办报事业陷入困境，亟需转换新的宣传阵地。这时，毛泽东在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中结识到的成员李振翩、龙伯坚与张维向他抛来橄榄枝，他们邀请毛泽东出任《新湖南》的总编辑。《新湖南》是五四运动时期由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创办的周刊，龙毓莹（字伯坚）任主编，编委有李振翩、张维等人。毛泽东为什么会接编一份医学生的报纸呢？他在1919年9月5日致黎锦熙道出原由：“《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封停刊……此间有一种《新湖南》，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毛泽东急于找到一个宣传思想主张的阵地，而医学院校的报纸是一种理想的掩护场所。《新湖南》第七号即由毛泽东接手主编，不幸的是，《新湖南》在出至第十一期时就遭到了《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被张敬尧军阀政府所查封。尽管《新湖南》在毛泽东主编后只发行了短短几期，但已为它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湘江评论》、《新湖南》虽然最终都落下帷幕，但他们的文字仍像一把利刃，穿透黑暗的云雾，直击人心，指引着一代在黑暗中迷茫探索的中国新青年，引导了一大批青年投身到救国革命事业中来。萧劲光曾谈到：“弼时同志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主席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郭亮、向警予也是受到这些报刊的影响才投身革命的洪流之中，后来均成为我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

100年前的呐喊，100年前的怒吼，100年前的思想，今天的我们在重读这些百年的文字时，仍能感受到那个穿着汗衫，满头大汗的青年在烛灯下奋笔疾书的热血之情。这是一个青年以伟力之笔分割旧社会的开始，这是历史的激荡，这是思想的力量，这是来自烽火中的时代强音。

高谊贯于日月 精诚动于鬼神

——毛泽东1917年4月写给白浪滔天的信

1956年5月1日，北京50多万群众汇聚到天安门广场，隆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这时，周总理带着一位日本老者来到毛主席身边，介绍说是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之子宫崎龙介。毛主席一听，立刻兴奋地握住宫崎龙介的手，说：“我在长沙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你的父亲，我还给他写过信呢。”宫崎龙介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既兴奋又诧异，因为他不知道父亲和毛主席有这样的交往，从未听父亲说过这封信，更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还保留在父亲家中。

毛主席怎么会在青年时期就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相识，这封信写的又是什么呢？

时间回溯到1917年，长沙。

4月15日，长沙人、辛亥一雄黄兴的灵柩归葬故里。长沙全城下半旗致哀，无数人列队送葬，包括不少专程远道而来的外国来宾，被孙中山称赞为“日本之大改革家”的宫崎寅藏就是其中之一。

宫崎寅藏，又名宫崎滔天，白浪滔天。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的一个武士家庭。早年受日本自由民权思想影响，积极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黄兴等人交往甚密。他不仅参加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第一批外籍会员，还主持创办了中国同盟会的重要宣传刊物——《革命评论》，在自己生活穷困潦倒之际，拒绝东京赤坂警察署署长的随诱，到处筹款替同盟会购买枪械。1911年追随孙中山北上返沪，见证了孙中山救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建立后，中日关系日益交恶，宫崎寅藏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革命，他曾激烈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对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寄予厚望，对流亡的革命党人给予全力庇护，是中国革命那段艰难昏聩的岁月中一位可贵的朋友。

1916年10月，黄兴病逝于上海，并于次年4月归葬湖南。宫崎寅藏闻讯后，“痛心欲绝”，“大哭特哭”，千里迢迢地从日本赶回长沙参加挚友的葬礼。

此时，24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正在苦寻救亡图存的“大本大源”。当时，凡属是来长沙城里的有学问、有思想的学者大家，他总会想方设法去听他们的讲座、演讲，并积极争取当面请教和探讨的机会。虽然当中不乏有人并不待见这个年轻的不速之客，但毛泽东从不计较和气馁，只图达到求学的目的。宫崎寅藏因

为长期坚定而真诚地支持辛亥革命、满腔热情地举办《革命评论》和无私无畏地救助革命者，早让毛泽东有所耳闻。得知宫崎寅藏来到长沙，毛泽东立即与好友萧植蕃（萧三）商议，寻找与宫崎寅藏当面请教和交流的机会。他们决定给宫崎寅藏写一封信，明确且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愿望：

白浪滔天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为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风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甚幸，甚幸！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上

这封信由毛泽东执笔，文字虽简练，但颇富文采，情感自然而真挚。字里行间，对黄兴的敬重和对宫崎寅藏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青年学子真心向学、虚心求教之情跃然纸上。同时，面对一个颇有名望的外国友人，当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师范学生的毛泽东，能提笔写信求教，其果敢和勇气也尽显无遗。

这封信辗转到了宫崎寅藏手中，之后他们之间的交集，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说法。一是宫崎寅藏慨然答应了两位青年学子的求见，三人相谈甚欢，乃至宫崎寅藏进而应毛泽东、萧植蕃的邀请，前往第一师范做了主题为“亚细亚的振兴，黄色人种的团结”的演讲，收到一师学子的热烈欢迎，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而另一种说法是来自毛注青编著的《黄兴年谱》中的记载，他曾为此事特意给萧三去信核实，萧三回信说：“宫崎在葬黄兴时到了长沙，故我们请见他，但没有见面”。

无论是当年见了面还是遗憾未能谋面，但这封信却真实地交到了宫崎寅藏的手中，并一直被他悉心珍藏。而时隔四十年，已经是新中国领袖的毛泽东，也能清晰的记得青年时期曾想请见的师者和自己为此写的信。

宫崎龙介在天安门城楼上听毛主席这么一说，才知道自己的父亲竟然和毛泽东主席有这样的渊源，而早在1922年就已经去世的父亲，如果能泉下有知，又该何等欣慰。宫崎龙介迫不及待地回到日本，在父亲的遗物中仔细查找，终于在父亲的旧稿中找到了这封漂洋过海被父亲带回日本并一直悉心珍藏的信。虽然纸页已经泛黄，但刚劲有力字迹清晰如昨，宫崎寅藏对中国革命“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于鬼神”的珍贵友谊力透纸背，青年毛泽东“今者愿一望见风采，聆取宏教”的寻师问的道精神历久弥新。

湖南自治 最后的“觉醒”

——从夭折的“湖南共和国”说起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是湖南人杨度在其《湖南少年歌》中说的一句话，语言充满着壮气豪情，极言湖南英雄辈出，人民有爱国的传统。

的确，在那个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时代，多少湖湘儿女面对民族危亡、新旧鼎革的大变革，他们始终“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重任，谱写出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迸发出璀璨的历史光芒。

所以注定——湖南是一个不平凡的地方。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联省自治”的口号在这片热土上率先提出，就是其中一件极不平凡的社会鼎革运动。它从1920年开始到1926年结束，是湖南处在南征北伐战场重重危机中的无奈选择。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革命先驱者的努力和足迹却不应被遗忘。因为这场所谓湖南省治，所谓联省自治，事实上是中国人民主共和之梦的一个重要环节，无论其成功还是失败，留给后人的都是一笔不可忽视的遗产。特别是对于毛泽东等有志青年在探求人生道路和救国救民信仰抉择上，来了一个彻底的“清算”。

1920年7月22日，驱逐张敬尧之后新上任的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谭延　通电全国，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提出了“湘人治湘”的主张，正式拉开了湖南自治的大幕。

其实，早在谭延　发表通电之前，湖南已是一片自治的呼声，而且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湖南的士绅和学子们，早在驱逐张敬尧的运动中就意识到，驱张运动的结果可能不过是赶走一个外籍的督军省长，换一个本省的督军省长。如果那样，受本省统治者的压迫和摧残，与受外省统治者的压迫与摧残，对百姓的生活而言，又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所要争取的，是民主共和国国民应该拥有的那些权利。

此时的湖南，万象更新，改革之声，也日渐而起。

特别是在抗击张敬尧有功，“上仿”有劳的毛泽东等人感触最深。毛泽东更难抑心中之喜。给胡适的信中，他情不自禁地写道：　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又有了蓬勃之象。”

当然，回湘之后，最让毛泽东露脸的一件事，是长沙的《大公报》，以《对“湖南改造” 之主张》为题，将毛泽东在沪《时事新报》 上所发表的复曾毅书连续刊发，此文在湖南知识界，引起了剧烈反响。给曾毅的复信中，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他对湖南未来建设的新构想。在信里，毛泽东指出：“如湖南人的自决权，不能得到解决，即使一个张敬尧去了，百个张敬尧，还会环伺欲来，正因如此，我们决不能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所以，欲建设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据罗章龙回忆，其实，早在京城上访时，毛泽东就有了自治的想法。那时，他就主张，“要想把湖南，创建成中国的先进样板，应效仿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使湖南人民拥有自决权。”

自然而然，毛泽东开始投身湖南自治运动，他认为这是“驱张”运动的延伸与完善。

但是，当时湖南处于一种“表面和谐、内里翻涌”的“假平静”状态。新任湖南督军谭延　是一个“老油条”，他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以此来笼络人心。毛泽东听闻之后很振奋，立即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有关湖南自治的讨论中去。但很快他就发现谭延　在偷换概念，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毛泽东认为，“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完全不同，“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湖南要的是“湘人自治”，而不是“湘人治湘”。

有关湘人如何自治，毛泽东提出了“湖南共和国”的设想，并指出：湖南应当实现“全自治”，而不是“半自治”。当前全国全面自治还不具备条件，只能各省先行动起来，与当前混乱的“大中国”脱钩，等过个十几二十几年，各省都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

毛泽东认为“驱张”成功后，湖南已经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基本具备了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的条件，于是他号召湖南带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

不得不说，毛泽东这种构想非常大胆，但又缺乏可操作性。毛泽东之所以有这种构想，离不开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腐败又专横，许多

人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甚至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

但这个设想势必不能成真，因为谭延　只是在做表面文章而已。就在毛泽东频繁的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试图为湖南自治寻求出路的时候，谭延　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9月13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

毛泽东自然不能对这样的结果满意。于是，他、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共同起草了《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

10月5日至6日，该文件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签名者达377人，几天后增加到436人。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　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谭延　无奈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断然拒绝。一个月后，谭延　离开湖南，赵恒惕成为湘军总司令。赵恒锡比谭延　简单粗暴，把毛泽东召到警察厅诘问，意在恐吓。

毛泽东虽然未被吓倒，但这场轰轰烈烈的湖南自治运动，也就此不了了之。

自治的失败，让毛泽东的心情，晦暗到了极点。

重击之殇，使人觉醒。

这时最能反映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一件事，是他接到蔡和森、肖子升两人的信后表明的态度。

1920年12 月1日，他在给留法新民学会会友的长信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说：那种以教育为工具，温和改良的法子，虽然“理论上说得通，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为此，他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要等人家来推倒，大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所以，俄国式的革命，是山穷水尽皆路走

不通下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养后不采，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由这段话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已彻底放弃了改良的幻想。

至此，湖南自治运动从1920年开始，至1926年落幕，历时 6 年，是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运动中最完整、最深入的一次实践。它最后被扼杀，是历史的悲剧，但更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先驱们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一次次无情的打击下深刻看清到革命的必要性、合理性的“觉醒”选择。从此，他们彻底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义无反顾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道路，并由此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

积学贵有恒

——毛泽东为萧子升学习笔记《一切入一》题写的序言

杨昌济教授曾说过，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执教5年的时间里，最赏识和器重的学生有3位，即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这三位被称为“湘江三友”。毛泽东曾形容他和萧子升的关系：“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从1915年到1918年，毛泽东给萧子升的信，单单留存下来的就有13封，可见二人之间交往甚密。

萧子升，1894年7月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的一个书香门庭。他文思敏捷、才气纵横、书法了得。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所作诗赋、文章常在学校展览、传观。优秀的人总是相互欣赏的。在一师学习期间，他与毛泽东成为了共学适道的朋友。毛泽东酷爱读书，求知欲很强，经常会广泛收集一些当时流行的、有影响的书籍，这其中有很多都是通过萧子升借来的。1916年，萧子升打算将祖上传下来的经史子集，共77种，都无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萧子升的盛情十分感激，但对这份“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的厚礼又不想贸然收下。于是他致信萧子升，陈述了自己不能接受这份馈赠的理由，并拒绝了他的好意。看到这个情况，1917年夏天，萧子升索性将自己多年的读书笔记汇编成册，名为《一切入一》，邀请毛泽东为他题写序言。毛泽东欣然应允，这则序言全文333个字,系统地阐述了经过认真思考的，他所理解的学习方法。

君子治学贵有恒。序言中提出：“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做学问如修筑百丈之台，需从一砖一石打基础开始，台积而高，学积而博。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能做到融会贯通，从而内化为一己之学，掌握知识的精髓，这便是约的过程。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一师，毛泽东读书从早到晚，安排了五段课程：“晨读英文，午前八时至午后三时上讲堂，四时至晚饭国文，明灯至熄灯温习各门功课，熄灯后以一时运动。所谓五段者如此。”他上课时总是端坐静听，认真思考和做笔记。课余时间毛泽东不是进图书馆、阅览室阅读，便是找老师请教或与同学交谈学问。毛泽东这种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深受杨昌济等师长的影响。杨昌济强调，“自古无速成之学者”，应于“坚忍”二字处着力，以久制胜。“一句之中，不容有一书之阙；一月之中，必须有数十条通透之识；一年之中，或抄或作，必须有一

二卷之成书。十年之中，必须小成；三十年之中，必须大成。如是以终身焉，则恒之谓也”。学贵坚持，做到终身学习，才能得“大成”。毛泽东一生读书、积学，恒久而不间断。他读书时就有“四多”的习惯，即“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从青年时期到晚年，他对自己喜欢的书，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研读。一部《资治通鉴》，他通读过17遍，其中不少精彩的文章他都能背诵如流。对史籍《二十四史》，他不仅全部通读，而且对许多卷册都反复阅读。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读，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在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君子治学在于精。序言批评了中国旧学的弊病“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他指出，做学问应该“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意思是学问不但要博，尤其要精，在博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加以条理，取其精华。杨昌济提出“读书之要，在反复细读，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毛泽东将这些话铭记在心，躬行实践。他听课时认真做笔记，课后整理；他善于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读书时于书的空白处写批注。对于有的句子和段落，他用不同颜色的笔多次标注，分析论述。“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这样的读书，虽然进程慢一点，但不但能记得牢，而且懂得通透，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曾把屈原的《离骚》一丝不苟地抄录到笔记本上。他留下一部《讲堂录》，约一万多字，主要是国文课和修身课所作的笔记。一部《伦理学原理》。他作了大量批注，约有一万五千余字。这样“不动笔墨不读书”，是“从他的老师徐特立那里学来，从青年时代起坚持一生的读书习惯”。

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忘阅读。一次，他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1975年，他的眼睛做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又开始了大量阅读，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手不释卷。据毛主席身边的护士说，直到逝世前，他都在读书。

在中南海颐年堂，有一个菊香书屋。毛泽东逝世后，工作人员清点这里的藏书，竟然达到9万多册。涉猎范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大类。

积学贵有恒，一切入于一。毛泽东写过一副自勉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他博览群书，读书数量之多和涉猎领域之广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在中南海颐年堂，有一个菊香书屋。毛泽东逝世后，工作人员清点这里的藏书，竟然达到9万多册。涉猎范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大类。读书学习对他来说既是一种终生的追求，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探寻伟人读书路径可以发现，他是以“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的积累功夫，扎下根系、培植土壤。以深入思考的精读建立主干、以海纳百川的博读添枝加叶，从而成就了知识的“参天大树”。他“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既让人敬仰，又催人奋进，值得每一个读书人学习。

伦理学原理批注——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

《伦理学原理》，这本十万余字的德国哲学家鲍尔生的著作，24岁的毛泽东曾“越读越觉得有趣味”；一万两千字的批注，清晰见证了青年毛泽东的学习态度和哲学观；原著与批注的交相辉映，见证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极为推崇“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方法，注重读、思、写三者的结合，他所写下的听课笔记、读书笔记、文章批注按语等不少于百万字。毛泽东投身革命后，曾将自己的课本、书籍、日记等全部存放于韶山老家。土地革命期间，乡亲们担心它们落入敌手，将这些资料放到后山烧毁，多亏私塾先生毛宇居心急火燎地从火堆中抢出了一些残页，其中包括毛泽东当年听国文和修身的笔记，以及手抄的《离骚经》《九歌》等资料共计47页，1万余字。而一本写满毛泽东批注的《伦理学原理》，却因当年被同学借走，而得以幸运地完整保存了下来。

这个同学叫杨韶华，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学友。他极为敬佩毛泽东的学识和才华，即使毕业后，也经常地前往毛泽东租住的清水塘一起研究学术、探讨时事，并借走了这本写有毛泽东笔记的《伦理学原理》进行学习。此后，来不及还书，大家就各奔东西，近30年无缘相见。直到1950年9月，杨韶华得知毛主席在一师的同班同学周世钊要去北京，特意风尘仆仆地找到周世钊，托他将这本曾借阅的《伦理学原理》归还毛主席，并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

翻开这本100多年前的哲学著作，空白处一行行细密而工整的毛笔字，都是24岁的毛泽东写下的读书批注：

“此意极精，可谓伦理学一大发明，”

“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

“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此段言宗教与道德关系之进化，颇好。”

“此处又使余怀疑”。

1917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教授西方伦理学的老师是有着十余年留学经历的杨昌济。他以亲身经历讲述留学见闻，介绍西方历史进程，令毛泽东颇感兴趣。《伦理学原理》原作者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中文本是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杨昌济将次数作为教材，选取部分内容作为教材。

当时多数同学对哲学不感兴趣，而毛泽东却饶有兴致地花了近一年时间，将十万余字的整书进行了通读。他边读、边思考、边记录，竟然在书上留下了超过一万两千字的批注。工整的行楷写在页眉、页脚、段落之间，短的只有几个字，长的形成了一篇完整论述：

“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

“吾常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

这些论述反映着青年毛泽东当时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毛泽东在阅读时，还在书上逐句用毛笔加以圈点，用单杠、双杠、三角形等符号标记处重点语句，极为认真。

阅读这本书之前，毛泽东就对哲学尤有兴趣，1917年8月，毛泽东给自己的老师兼好友黎锦熙写信时还谈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需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而《伦理学原理》带来的一些唯物主义观点则让毛泽东“越读越觉得有趣味”。1950年毛泽东与周世钊的谈话时曾回忆说：

“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而中国正在经历着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新旧思想激烈交锋。还有一年就要从第一师范毕业毛泽东不仅思考自己的未来，更迫切地寻找着救国之路。阅读《伦理学原理》近一年时间，毛泽东的想法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之前想从改造人心入手，寻求救国之道的他，更渴望在这场社会变革中建立一个新世界。也正是在这期间，毛泽东筹备、组织、建立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重大的新民学会，最终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一个再造世界的蓝图正在毛泽东心中酝酿。正如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充满豪情地写道：

“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时光荏苒，当毛泽东于1950年再次见到这本书时，也有了另一番评价：

“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时隔三十年，一本书“失而复得”，毛泽东有了新的思考，当年那个心怀救国之志的24岁青年，也已经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一万两千余字的批注，是一场作者与读者跨越时空的思想交锋，更是毛泽东一生探索新知和不懈追求真理的生动展示。

毛泽东与《新青年》

107年前，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书刊在上海创办，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李大钊在该刊发表《青春》一文，大声疾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新青年》带来了新思潮新文化，它不断冲击着旧势力旧思想，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影响着一代中国青年，在中国革命史的地位举足轻重。

当时还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一名普通学生的毛泽东是《新青年》忠实的读者，深受其影响。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这样谈到《新青年》时说到：“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他是读者，也是投稿者，更是《新青年》坚定的拥护者，可见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新青年》必定给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这样一份影响深远的刊物，在当时的发行量却少得可怜。据统计1917 年，《新青年》的全国总印数为每期一万五六千份（包括大量免费赠送），远不及当时的商业刊物。但《新青年》却凭借其振聋发聩的言论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一时间风靡全国。《新青年》成为全国名刊之后，它的声音也是传到了湖南，“自五四运动霹雳一声，惊破全国大梦，于是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

毛泽东便是这一时期开始与《新青年》结下了缘，这又与毛泽东恩师杨昌济先生对他的引导是密不可分的。杨昌济对报刊阅读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人不可一日不看报章杂志。报章杂志乃世界之活历史也，即皆自我之实现也。日日看报，则心目中时时有一社会国家之观念，而忧世爱国之心自愈积而愈厚，且得有种种之常识，积累久之，则深明世故，可以应无穷之变，投其所向而无不如志。此真精神知识之营养，如饮食之不可缺者矣。”“日日看报，即所以存君亲民于我也”。不阅报之人“怠于观察，怠于观察则懵于时势，一旦有事必至有手足无所措者，不可不加深察也”。杨昌济颇为看重报刊的价值，故其积极提倡阅报。1915 年，《新青年》创刊之时，杨昌济就注意到了。在阅读《新青年》之后，他将《新青年》分送给邓中夏、蔡

和森、毛泽东、张昆弟等人。他们聚集在天鹅塘，经常在一起交流阅读心得，思考和讨论《青年杂志》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救国之情溢于言表，这批青年也成为了《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

当时，中国旧社会在经过了闭关锁国和鸦片的侵蚀后，整体国民身体素质下滑，被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毛泽东对于当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埔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的学校教育的状况甚为不满，身边不断因身体孱弱染上疾病的同学们也让他深感痛心，同时，受到当时教育界对与体育教育方面的批判反思思潮的影响，毛泽东希望能发出自己的声音。1917年4月，在杨昌济的指引下，24 岁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撰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此文写出后，毛泽东交给杨昌济审阅，杨昌济对其格外赏识，便将其推荐给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于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国力　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体育的作用在于能“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展示了毛泽东早期“健身强国”的体育思想。毛泽东还直接把陈独秀的思想引人文中,写到“近人有言曰: 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 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 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阐发的“野蛮其体魄”是对陈“兽性主义”的具体发挥。“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生平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其中关于体育方面的思想在后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先后成立了新民学会、互助会，随后他们还创办长沙文化书社，聘请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作为信用介绍人，文化书社先后在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隆回、溆浦设立分社，在长沙、浏阳等地设立贩卖部，开始销售《新青年》杂志，这对《新青年》的发行与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育改革。其中，《新青年》中的某些内容被作为改革的教材来使用，得以使《新青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广泛传播。以一师为平台，《新青年》的影响遍及省会长沙，影响了诸多在长求学的学子。后来，毛泽东说：“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 陈独秀被毛泽东称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可见陈独秀不仅对毛泽东十分赏识推举，更对其思想有重要影响。

毛泽东与五四运动——湖南学生联合会

1919年4月，巴黎和会决定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5月4日，北京五千名学生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大家高呼“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群众把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也烧了。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当时，皖系军阀张敬尧主政湖南。他对湖南人民实行恐怖的高压政策，禁止举行各种爱国运动，严密封锁五四运动的新闻。紧接着，《大公报》冲破新闻封锁，登载了青岛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以及北京学生的爱国壮举，湖南学界一片沸腾。

这一年，毛泽东年仅26岁，此时的他刚刚结束了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返回长沙不久，在修业小学当一名教师。听闻五四运动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召集新民学会成员何叔衡、周世钊等商议，决定响应五四运动，他写了一张措词激烈、鼓动人心的传单，以一师学生会名义发出，宣传“毋忘国耻，誓死反抗”。

5月7 日，新民学会会员用学联的名义组织省会二十所中等以上学校，举行声势浩大的国耻日示威游行，以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执白旗上书“誓必争回青岛”，可最后被军警强行解散。至此，毛泽东感觉到，建立一个规范的学生联合会，以便统一组织爱国行动已经迫在眉睫了。当时，在长沙一些学校如第一师范、商业专门等校的学生组织比较健全，开展社会活动也有一些经验，他首先和这些学校的学生中的骨干分子密切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随即开始紧锣密鼓进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恢复和改组工作。

5月25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邓建议湖南积极开展学生运动，以形成全国的学生运动的态势。毛泽东表示新民学会将积极响应全国号召，联合长沙各校发起学生运动。

毛泽东是实干家，25日当天，他召集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的彭璜、易礼容，省立第一师范的蒋竹如、陈书农，工专的柳敏，法专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学的唐辉章，雅礼学的李振翩，周南女校的魏璧、劳启荣，楚怡工校的朱后郑，长沙师范的缪瑞祥，妙高峰中学的向培元等20多名学生代表在楚怡小学开会。他发表演讲：大家都看到了，陈独秀先生的口号，就是全体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问题，我们湖南也不能

落后，我代表新民学会提议，迅速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同时，紧急联络湖南各界，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3天后，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在长沙落星田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成立。学联会章以“爱护国家、服务社会、研究学术、促进文明”为宗旨。

6月2日，湖南学联召集全市学生大会，大会通过了全省学生总罢课的提案和宣言。毛泽东起草的“罢课宣言”称：“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我湖南学生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势之要求，决议自六月三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

“罢课宣言”发表后，在湖南学联的统一领导下，长沙各校纷纷罢课。工业专门、商业专门、明德学校、楚怡工校、第一中校等学校率先罢课，在长沙学生的带动下，全省各地的学生也陆续罢课。学联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六项要求。在学联的倡议下，从学生到工人、商界，几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五四时期的湖湘儿女，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风暴带到哪里。

毛泽东一直站在运动的前哨，成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也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他认为在长沙办一个刊物很有必要。由此，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以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报的名义发行。“创刊宣言”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整个第一版的篇幅。毛泽东写道：“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先后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章。在《 民众的大联合 》一文中 ，他旗帜鲜明地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正面影响。

然而，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军阀张敬尧的干涉。张敬尧通令各校提前考试，以瓦解学生组织。1919年8月，《湘江评论》的第五期刚刚出版而尚未发行即遭查封。湖南学生联合会被张敬尧强令解散。1919年11月，长沙各学校代表重组湖南学生联合会。此后毛泽东领导重组的“学联”，继续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北京、上海、广州等省内外力量开展了“驱张运动”。但是，张敬尧直到1920年6月才在各派军阀压力下从长沙仓促出逃。这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有了深刻认识，依靠思想解放和学生运动，无法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无法改变军阀割据的现实，也无法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影响下逐步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遗址位于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与落星田交会处。历经文夕大火和几十年风雨沧桑，旧址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先辈救国救民的革命精神和推动民族复兴的决心，一直灿烂星河中永续流淌，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毛泽东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信

光亮兄：

廿四号来信收到。全国大考在湘举行，此间教务会议议决照办 。惟日期主张宜在六月初 (或五月底)，即在西校大会之后，此点重要，请斟酌为盼 !文化要劳动史四百本，请速照发 。

弟 子任

三月七号

这是1923年1923 年3 月7 日毛泽东写给施存统的一封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相关事项的致信，信中用了几处代号隐晦的表达了其用意，其中“全国大考”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会议，“西校大会”是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信中建议“团二大”的开会日期改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可见会议召开深受毛泽东意见的影响。事实上，当时“团二大”的召开可谓“一波三折”，会议最开始定于7月10日在长沙举行，但不久长沙爆发日本水兵枪杀中国平民的“六一惨案”，会议随即改址改日期，几经波折之后最后于8月20日，在国立东南大学梅庵成功召开。

1920年5月以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等人在第三国际远东局代表威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新青年》杂志社，经过多次酝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作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当时的名称就叫“共产党”。它除了出版《新青年》《共产党》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地建党，开展工人运动以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领导青年运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五四运动以后，许多青年由于反对腐败的军阀统治和封建礼教的束缚，离开了学校和家庭，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杂志社，寻找出路。陈独秀等发起组的同志们热忱地接待他们，安置他们，并委派发起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和张太雷，于1920年8月，在这些青年中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简称“S·Y·（英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缩写）。俞秀松任书记，主持团务。最初只有八名团员，后来在“工读互助团”中积极发展，不到一个月，就达到三十多名。刘少奇、罗觉，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贺昌、许之桢、傅大庆、梁百达、王一飞等人都是最早的团员。

上海团组织成立不久，全国各地的青年积极响应，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地的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

其中在长沙青年团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1920年在长沙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毛泽东就开始着手青年团的创建工作，1920年11 月中旬，毛泽东致信张文亮（湖南湘潭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随信寄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十份。信中托张文亮为发展团员“代觅同志”。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拟发展为团员的对象。11月 21日，在湖南通俗报馆毛泽东和张文亮会面，告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同年12 月 2 日，毛泽东到张文亮处，商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问题。他提出建团应分两步进行，第一研究，第二实行。要“多找同志”，青年团成立会，等陈独秀来湖南时再开。当月中旬，毛泽东复信张文亮说：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12月16日，毛泽东又赴张文亮处，商讨召开青年团成立会问题。

在毛泽东等人积极地运作下，1921 年 1 月 13 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长沙建立第一个支部，毛泽东兼书记；当年下半年，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次年 6月 17 日，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书记仍是毛泽东，他分管组织、财政，负责搜集各地团组织的报告以及发通告等事务。毛泽东同志对建团工作采取了积极而慎重的方针，十分注意团员的质量，反复强调要“找真同志”。所以，新民学会中的先进分子，如郭亮、夏曦、肖述凡等人，都加入了青年团。

此后，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又一直高度重视共青团与青年工作。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十分关心青年和青年工作，多次对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青年是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成立至今也已走过百年的历程，它从一颗稚嫩的新芽，历经风雨锤炼后如今也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民本主义教育方针之“人物互选”

“国家之盛衰视人才，人才之消长视教育，教育之良窳视师范。师范者教育之教育，固陶铸国民之模范，造就青年中国之源泉也。”这是二十世纪初，湖南第一师范发布的一则《招生广告》，一经发布便引起轰动，短短几十字道出了师范教育对人才培养，对国家的重要意义，湖南第一师范一时间成为湖南进步青年向往的学府，也为当时黑暗腐朽的旧社会输送了新鲜血液。今天我们回望过去，湖南第一师范之所以能在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与学校推行的育人方针是密不可分的。

湖南第一师范当时积极响应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教育改革条令，开始推行民主教育，聘请了一大批品德高尚、学识渊博且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担任教师。孔昭绶便是在这一期间进入第一师范并出任校长一职，孔昭绶于1913年1月至1914年1月和1916年9月至1918年9月两度出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他在担任校长期间，顺应时代潮流，博采欧美各国的教育经验,进行教育改革，重视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思想素质，大力推行自动自治相结合的民主教育，积极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取得了突出的办学成就，被后人称为“民主教育的先驱”。孔昭绶运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来规划学校教育、校园建设，制定新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倡导学生自动与自治，“采最新民本主义规定教育方针”，“以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唯一之教旨”，孔昭绶主张“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并制定了以“知耻”为中心，包括“公诚勤俭”诸内容的校训。所谓“知耻”，就是要使人人知“国家之耻”，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而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使“人人之实力充足，而后国家之实力充足”。他认为，学生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就是充实自己的实力，因此，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就是“根本解决”民族耻辱和民族危机的关键。

为提高学生自动与自治的能力，孔昭绶于1913年创设的技能会，几经改名，到1916年9月正式定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该会“以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专为补助学校教育而设”。学友会设有教育研究部、演讲部、文学部、书法部、图画部、手工部、音乐部以及各项体育运动部，各部都围绕各科教学展开一系列课外活动。同时，要求学生按自己的志愿，利用课余时间到学校的农场、工场和社会上的商场进行农工商业的实习。同时还“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开设了附设小学和工人夜校作为学生进行教育实习和与实践相结合的场所。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一方面对学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又给学生以很大的自治权。学友会原来由各科教员担任各部部长，后来改为全部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担任，并由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特别是一师实行的人物互选制度更是提倡学生自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所谓人物互选即每学年由学生按照所定的德、智、体3方面的标准进行一次投票互选人物，作为对学生考核的依据之一。考核的内容分为六项，分别是：敦品（如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自治（如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胆识（如冒险进取，警备非常）、文学（如长于国文词章）、才具（如应变有方，办事精细）、言语（如长于演讲、论辩应对）等，这个举动很好地强化了学生们的民主意识。在1917年7月的一次选举中，全校 11个班,400余人参加, 当选者 34 人, 其中毛泽东在德、智、体三方面的“敦品”、“自治”、“文学”、“语言 ”、“才具” 、“胆识 ”六项均当选, 他得票最多，其中，言语、敦品两项得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说明毛泽东是当时第一师范最为杰出的学生代表等等。

正是有如此开明的校长，开放的学校氛围，科学的教育针，当时的那批青年也得以在第一师范这篇沃土上迅速成长，在1917年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职员学生一览表上，记载着一群同学：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周世钊……在过去的百年里，这些名字，深深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史的方向。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说：“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发生的事很多，我的政治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获得了社会活动的最初经验。”主席的这番回忆便是对母校最大的认可。

明耻篇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是毛泽东在1915年5月7日在第一师范校方为学生编印的补充教材《明耻篇》的封面写下的十六字愤言。

这一年的1月18日，日本以支持袁世凯作皇帝为条件，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签订。5月9日，袁世凯竟然接受日本要求。消息一经传出，举国激愤。

随后消息传到长沙，一师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口诛笔伐运动，在明耻大会上，校长孔昭绶做了这样的发言：“有一个词，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支那。这是日本对中国的称呼，在日本人嘴里，中国就是支那，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支那人，那么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起初我也不清楚，只知道这是自隋朝起，从天竺语“摩诃至那”中派生的一个对中国的称呼，词义并无褒贬。可就在五年前，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学校给我准备的学籍表上填写的就是支那人孔昭绶。每次遇到日本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看支那人来了。他们当时说话的表情，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是一种看到了怪物，看到了异类，看到了某种不洁净的东西，看到了一头猪混到了人群里，才会表现出的轻蔑和鄙夷。于是，我就去查字典，我不相信日本人的字典，我查的是荷兰人出的1901年的《荷兰大百科通用词典》。我查到了:“支那，中国的贬义称呼，常用于日本语，亦指禺蠢的、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这就是支那的解释!”（摘录于《恰同学少年》台词）可见当年孔校长的愤慨。

而此时的国文教师石润山，也是辍寝忘食，义愤填膺，赶写了揭露袁世凯与日本勾结、出卖祖国罪行的文章。毛泽东读后深受教育启发，建议石老师还收集其他教师文章，编辑一本读物给同学们。石润山采纳了毛泽东建议，马上出版了《明耻篇》作为一师的补充教材。

毛泽东读到这本《明耻篇》后，更是“心事逐浪高”，在该书封面上挥笔疾书写下这16个字，把爱国青年同报仇雪耻联系在一起，激发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毛泽东还把该书广为寄赠、荐阅，并到处去演讲、撰文、发表言论，扩大仇日宣传及反袁宣传。由于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的激烈言行和出色才干，把爱国师生团结起来，在一师形成了反帝爱国的热烈气氛，影响波及到了长沙各校。

驱张运动（平民通讯社）

1918年，即将从湖南一师毕业的毛泽东等同学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4月14日，以一师学生为主体的新民学会召开了成立大会，两个月后，新民学会在一师附小召开会议，确立了“国外发展”、“国内研究”的两条发展路线。为了实现国外发展的策略，新民学会组织湖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一八年九月来到北京。

北京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和罗学瓒等八位新民学会的会员就住在景山东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这里和北京大学很近。他们的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但他们学习求教却是十分方便，参加各种思想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机会很多。同时也是在他们的老师杨昌济的引荐下，毛泽东来到北大红楼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的职位，这样可以让他自由出入北京大学听讲。这样短暂的五个月生活，他的精神生活过得极为充实，极有意义，比长沙时代丰富多了。

不论是寻找新知识、新朋友、新的社交活动经验。北京都是一个值得留下来的地方，但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出生在悲惨的村庄和封建军阀独裁统治下长大的年轻人，他始终无法忘记生活和战斗了二十五年的湖南。此时的湖南还是北洋军阀张敬尧的屠场，湖南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在亲自送别了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后，就回到湖南来了。

张敬尧的昏暴统治让湖南广大人民所不满，人民的愤恨有加无已。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一九九四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他密切关注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以及各地人民的爱国运动，对局势做了精准的预判，将“五四”前后以反日反卖国政府为中心的群众爱国运动逐渐转为驱张运动。

暑假过后，学校相继开学。尽管张敬尧解散了学生联合会，但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他仍然秘密的开展各项工作，并且在11月学联会发表了“再组宣言”，恢复了公开活动，提出民众在国家事件中“自主自决”的方式，并鼓励湖南人民站起来推翻张敬尧的统治。学联会的主要活动依然是清查日货，反日游行，并与张敬尧抗衡。12月时，在教育会坪再次举行了焚烧日货的联合行动。那天，以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高举“民众联合！牺牲奋斗！福州危矣！打倒强权！抵制劣货！”等旗帜，很多炼油厂的工人、商店的员工都参与进来了。等到国货维持会拿出所有日货，与此同时，几

组学生纠察队从八角亭附近的商店清理了大量日货，并将其运送到教育会坪准备烧毁。正在举起火把之时，张景尧派他的四弟敬汤率领1000多名军警包围了现场，并下令殴打和刺杀手无寸铁的弱小学生，甚至在场的小学生也是遭到毒打，最终导致数十人受重伤，数千人被驱逐。

这是对湖南青年学生、对湖南教育界、对湖南人民的残酷镇压！这是一个爆发点，横暴昏庸的张敬尧点火自焚了！

毛泽东同志连夜召开新民学会和学联会会议，汇报情况，提出对策。他和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湖南各级人民已经达到了张敬尧愤怒的顶峰，广大年轻学生、教育已经达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张敬尧不仅是在湖南，在全国也臭名远扬。与此同时，两支皖直系军阀正相互水火，与驻扎在衡阳的军阀吴佩孚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也是反感。驱张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的关键是动员群众，特别是学生和教员，发动全面罢课，高举驱张旗帜，以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同张敬尧斗争到底。

在学生总罢课之后，各校教职员是否也宣布总罢教。在教育界引起激烈的争论。由于健学会的中坚作用，以及毛泽东同志与何叔衡等在教育界工作的新民学会成员活动的结果，长沙七十三所公私立学校的教职员终于紧跟着学生总罢课之后，宣布湖南教职员一千二百人总罢教了。这对张敬尧的统治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总罢课、总罢教成功之后，就是驱张的具体活动了。经过短时间的酝酿，大家一致商定这样几个办法:

一、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汉口、衡阳、常德、广州等地，一方面伸张民气，造成声势，扩大驱张宣传；另一方面利用北军各系内部矛盾和湘军急欲收复失地，从军事上压迫张敬尧；二、由各校派出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分别组成学生和教职员两个代表团，去北京的还组织一个总的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团；三、一部分人留守长沙，坚持省内驱张活动，并负责同外地各代表团的联络。

各路驱张代表团人员都在十二月中旬分途出发。前往北京的主持人有毛泽东同志，他任公民代表团团长。十二月十八日,驱张代表团三十余人到达北京。一九二零年一月三日,北京学联又召开大会。在大会上湖南学生代表详细地说明了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罪恶暴行，激起北京学生的无比愤慨和同情，同时湖南学生代表团发表了“罢课二次宣言”，代表团还携带了大批揭露张敬尧罪恶的专刊和小册子向各方散发。为了

向全国及时传播驱张运动的消息,造成舆论,争取各界援助,代表团到达北京后,即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由毛泽东同志任社长.向京、津、沪、汉等地报纸发布新闻稿件,每天发行一百五十余份。于是全国各地报纸据此纷纷揭露张敬尧的罪恶。此外，在一个月内，学生代表团共到北京政府的总统府、国务院作过七次请愿活动，递送过三次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的呈文。各界公民代表团和教职员代表团也作了类似的活动,向北京政府控诉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

在省内外一致声讨的形势之下，张敬尧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一方面加紧高压政策，同时又兼施怀柔，收买动员少数归附于他的教育界败类，并且派人到北京贿赂学生代表，散播种种谣言，以离间代表团人员。但是所有这些手段无不一不失败。

一九二零年初，两皖系军阀利害冲突日趋剧烈。三、四月时,驻湘直军、奉军等,由吴佩孚领衔,以全体官兵名义连续通电全国,控告张敬尧的搜括政策。张敬尧已处四面楚歌之中了。在湘军的紧逼之下，张军无心作战,望风而逃。在长沙作了最后一次掳掠搜刮之后，六月十一日,张敬尧仓惶逃走。

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一个发展,是刚刚开始的全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张敬尧的败走,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驱张运动本身是一次成功的反军阀运动,民气终于战胜了民贼，大大壮大了湖南人民的革命力量，同时对全国的民主运动、革命势力，也起了鼓舞作用。

青年毛泽东的“北漂”生涯

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第四展厅的展板上，陈列着这样一张工资单：毛泽东八元。这是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图书管理员时的薪水。

1918年8月15日，刚从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事，风尘仆仆由长沙乘火车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的长途之旅。经过思考，他没有和同学们去法国，而选择留在北京，成为一名“北漂”。既然留下，京城米贵，怎么生活？他举目无亲，而且又是借了钱去北京的，只能暂时投宿于恩师杨昌济家中。

北京鼓楼豆腐池胡同15号（现为9号），这是一座两进院落的小型民居建筑，形式是北京最普通的硬山合瓦顶，上面挂有“板仓杨寓”。这里就是当年杨昌济的家，也是初入北京的毛泽东借住之处。

对于这位高材生，杨先生希望他最好能在北大继续读书，可当时教育部规定，中等师范生毕业后，必须先工作几年后，才能报考大学。那么对于“北漂”的毛泽东，首先必须找个工作，解决吃饭问题。

这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杨昌济找到了主任李大钊：“李先生，我有一位学生从湖南来——毛生泽东。此生资质俊秀，为人勤奋。不知李先生能否为他在图书馆里安排差使?”

“好，好，你请他来。”李大钊一口应承。

翌日，杨昌济便领着瘦长的毛泽东，去见李大钊——这是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头一回与二十九岁的李大钊会面。

李大钊带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三十一号的第二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

“你的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月薪八元。”李大钊对毛泽东说道。

这对于来自外乡农村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很大的满足了。

过了好多年，当毛泽东跟斯诺谈及这段经历时，他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其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六百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四百元；教授，月薪起码二百元。

低收入——月薪八块大洋；低职务——图书馆佐理员，一天的工作是管理15种报纸；更有一个困苦，没有栖身之处，与现代“北漂”人没有什么两样。

工作解决了，住处也得解决，总不能老是住在杨教授家里。经杨昌济的帮助，毛泽东和蔡和森搬到了“新居”——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三眼井里的吉安所东夹道7号，现为景山东街吉安所左巷8号。吉安所又称吉祥所，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可见这里当年并不怎么高贵，房子也就好不到哪里去。毛泽东他们租住房间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小房。房间里的设备陈旧简陋：一个土炕紧贴南墙，炕上铺一条破旧炕席，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晚上，一盏昏暗的小油灯，只有挂在墙上，它的弱光才能充满房间。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昆甫、罗章龙等8人就住在这间小房子里。毛泽东在1918年11月致罗学赞的明信片里写道：“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对此，罗章龙的解释是：“‘大被同眠’这句话有个典故:唐朝有个姓张的人，是个大家庭，张公倡议全家人住在一个屋子里，盖一个大被子。我想，这可能是象征一家人团结的意思。润之的这句话，是形象思维的话。”住得狭窄，吃得更是糟糕。

据罗章龙回忆：“北京米贵难卖，我们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末充食。一次，子升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虽饿亦无法下咽。。。”

一个“北漂”人，受冷遇是免不了的。

有一次，胡适在北大图书馆演讲，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他请教。胡适问旁边的人：“提问的是哪一个？”当得知是一个不在册的小职员后，竟拒绝回答问题。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受冷遇后，自暴自弃还是自我奋起？

毛泽东的态度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他很珍惜北京的文化氛围。报纸阅览室的楼上是校长蔡元培办公室，胡适、鲁迅等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借阅书籍和报纸。近水楼台先得月，毛泽东有机会向他们请教，尽管还要受到冷遇。除此之外，他“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他经常步行到北大听讲座，还参加了两个学生社团。一个是1918年10月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毛泽东曾回忆说：“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这不仅是“写景”，也是“抒情”：季处严寒，心遭冷遇的“北漂”人毛泽东却看到了冰雪中包裹的春天。这是一种人生的自信，也是一种自我心态的调整。

毛泽东的谦虚态度和自身实力，让人们不得不由“冷”转“热”，机遇也随之而来。在北大图书馆，他最大的收获，是结缘了日后创建中共的两个巨头——“南陈北李”。报纸阅览室往左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往右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陈、李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也是五四运动的领军和核心人物，被人誉为“北大红楼两巨人”，“照古今”的“日月双星”。

1917年3月，正就读于湖南一师的毛泽东将《体育之研究》一文投向《新青年》。这篇文章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陈将全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有了这种渊源，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拜访陈独秀也就没有障碍了，而毛的谦虚诚恳态度，又给陈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陈当时就夸奖说，你那文章写得好，特别是“盖天地惟动而已”这观点有创见。从此，毛与陈来往密切，也就有了日后两人在上海的多次见面，也就有了陈独秀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党的由来。

毛泽东回忆自己这一时段的心路历程时说：“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不过，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但是，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引导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作为他的“顶头上司”，李大钊的言论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在图书馆，毛泽东每天固定的议程，就是向李大钊请教政治和哲学问题。1918年11月，他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也研学过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这些经历使他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正如1949年3月，他在西柏坡回忆时所说的：“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还不错，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他的指点和指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自古英雄出艰辛，梅花香自苦寒来。北漂是艰苦的，有生活的窘困，有前途的思索，有世态的冷暖，有毅志的磨砺。对于青年毛泽东，这段难得的北漂经历，让他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鲲鹏击浪从兹始”，从北大这所小小的报刊阅览室里，走出了一位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领袖。

屈子当年赋楚骚——毛泽东手抄《离骚经》

屈原是毛泽东极为崇敬的伟大爱国诗人，毛泽东既敬慕屈原其人,又崇尚屈原的作品。两人虽然出生年代相距2230多年，但屈原强烈的爱国热情,对光明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瑰丽雄浑的浪漫主义文风，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诗词创作。毛泽东与屈原跨越时空的神交，最早可见的文献资料为毛泽东1913年的《讲堂录》中手抄的《离骚经》和《九歌》。

这本《讲堂录》是毛泽东在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期间，听杨昌济的修身课程和袁仲谦的国文课程的时候所做的笔记。毛泽东对此极为珍视，毕业后将这本笔记连同其它资料一起放回韶山家中保存。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家人出于安全考量烧毁这些资料时，所幸当地私塾老师毛宇居及时出手，从火中抢出了一些残页，其中就包括残存47页的《讲堂录》。

翻开这本《讲堂录》，前11页就是20岁的毛泽东用俊秀的小楷工工整整抄写的《离骚经》和《九歌》全文，并在正文的“天头”上写下了《离骚》各节的提要，同时对许多诗句进行圈画和注记。这份历经烈火焚烧而得以保存下来的这些珍贵手稿，不仅让我们有幸见证了一代伟人“恰同学少年”时代勤勉的向学态度和扎实的书法功底。

从俊秀的抄写字迹和严谨的章法布局，更让我们感受到当时毛泽东心中对屈原的敬重，对屈原作品的珍爱。

《离骚》是中国战国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创作的长篇巨制，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同时，《离骚》也被誉为中国爱国主义诗篇的开山之作，是一首充满激情和斗志的政治抒情诗。屈原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式，将平生遭遇、心志和理想凝聚在笔端，成功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其为国殉身无悔、执着上下求索的精神以及追求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向往美好的人格和爱情的性格特征的政治品格，为后世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几千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精神上的感召和行为上的指引。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极为崇拜屈原。此时的毛泽东身处内忧外患的动荡时局，他崇拜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中那些为生民立德、立功、立言的伟大人物，他认为古

今中外一切圣贤的基本人格和本质力量是救民于水火的责任与担当。他将“鬲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作为人生信条，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征程上孜孜不倦地“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同道者”不仅仅是和他同时代的志同道合者，更有来自历史深处给予他智慧和滋养的先贤豪杰，屈原便是与毛泽东心相通、情相投、气相随的“同道者”之一。

青年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屈原的作品，其认真的态度和敬仰的心情，从笔记本上手抄的这份《离骚》可见一斑。《离骚》全诗，共373句，2490个字，毛泽东以欧体小楷全文工整誊抄，字体道劲隽逸，与其后来大气磅礴的毛体书法大相径庭，是毛泽东现存手迹中极为难得一见的小楷珍品。

同时，屈原在《离骚》中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正好吻合毛泽东的审美情趣和对艺术风格的追求，对其诗词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5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各大学校张贴了一份《征友启事》，诚邀能吃苦耐劳，有志于救亡图存的青年做朋友。其中“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语句，与屈原在《离骚》第97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遥相呼应。虽然通过《征友启事》，毛泽东只征得三个半好友，但其中罗章龙、李立三等人，后来都成为我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在党史上极具影响。据罗章龙后来回忆说：他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地谈了3个小时，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因两人都对《离骚》很感兴趣，针对主张赋予《离骚》新评价的话题相谈甚欢。后来，罗章龙赋诗以记交谈之事，题为《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诗曰：“白日东城路，　　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1918年，当罗章龙即将启程赴日本留学之际，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为其送行，临别时赋诗《送纵宇一郎之东行》相赠，诗中毛泽东以一句“年少峥嵘屈贾才”表达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追随和仰慕，“君行吾为浩歌”中“浩歌”则语出屈原《九歌·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兮浩歌”。由此可见，屈原的思想和人格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离骚》之风对其诗词的无声浸润。

1961年秋，毛泽东再次读起《离骚》，感同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触景感怀创作了《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全诗只有28个字，语言虽精练，但笔锋犀利，比喻虽浅白，但诗意深邃。毛泽东直抒心意地称颂了屈原以死抗争的不屈精神和《离骚》等作品犀利如刃的战斗威力。从1913年毛泽东工整手抄《离骚》，这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向历史深处的偶像致敬；近半个世纪之后，作为新中国领袖的毛泽东用雄健豪放的文笔创作《七绝·屈原》，是一个共产党人向时代的宣言：共产党人要像屈原那样，具有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坚定执着的政治理想、纯洁高尚的独立人格、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这是毛泽东的生命告白，是毛泽东的革命宣言，是毛泽东和屈原两个诗坛巨子的穿越数千年时空而共同创立的丰碑！

以民为本，取信于民——《商鞅徙木立信论》

《史记·商君列传》里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相传战国时期，秦孝公在位时，宰相商鞅力主变法。他好不容易说服了秦孝公和大臣们，但是，老百姓会相信你的新政策吗？商鞅想到了一个办法。一天，商鞅亲自来到国都的南门，令人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百姓不知所以，纷纷前来围观。商鞅宣布，能把这个木头扛到北门，赏十金。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第二天商鞅果断地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终于，有个年轻人出来试试运气了，他轻松地把木头搬到北门。众目睽睽之下，商鞅当场付款，小伙子如愿以偿得到了赏金。消息传开后，举国轰动了：商鞅是信守承诺！这件事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随后商鞅颁布新法，很快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使变法工作顺利推行。

假设今天的我们以此为作文考题，都可以从哪些角度来评价，非常值得深思。110年前，1912年春，年仅19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著名的省立高等中学校，也就是后来的省立第一中学。这年6月，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比赛，主题是读史用史，题目自拟。经过深入思考，毛泽东根据商鞅的故事和比赛的要求，联系当时的社会现状，写下了一篇人人叫好的作文，获得了比赛第一名。这就是知名的《商鞅徙木立信论》，而这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做的作文中唯一存世的作品。我们看到的这份手稿全貌，字迹工整漂亮，刚劲有力。

这篇文章的核心立论是：以民为本，取信于民。“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是为人民谋取幸福的工具。法令善不善，关系到是否利国利民。有益于人民的法令，必能为人民谋取更多的幸福，人民唯恐不制定、不公布这样的法令。有益于人民的法令，政府和人民都必须竭力去维护它、执行它，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充实、修改、完善它。这样的法令，人民哪有不相信的呢？法令如果不善，则不只是对人民无幸福可言，而且会危害人民，人民就会起来反对这种法令。

这篇文章紧扣“立信”二字。首先从立法的角度论述了法与民的关系，强调为政者要取信于民，法律、政策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出发点、归宿点，要有利于人民。有益于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会自动地去实现与维护；如果法律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损于人民的利益，那就会使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然后，又从执法的视角，阐明执法要严明、公正。有了好的法律，但不去执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

能取信于民；或对人不对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不公正，不透明，也不能取信于民。至于违法不惩治，那天下就会大乱，好人也会变坏。

毛泽东赞赏商鞅变法。他写道：“商鞅之法，是好法，是富国利民之法。”商鞅之法，奖励耕织，能够增进国民的富力；鼓励军功，能够树立国威；严惩奸邪，能够保护人民的权利；严惩贪官污吏，有利造福人民；统一度量衡，有利物资交流，促进生产发展；实行郡县制，有益于全国政治统一。“这是我国从未有过的大政策。”翻阅四千年我国的历史，“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毛泽东进而论说道：像这样的好法，最初人民为何“惮而不信”呢？为何要“徙木立信”呢？因为变法前的秦国政府失信于民，“黎民惧焉”。于是，毛泽东将笔锋一转，指向清朝末年及袁世凯当局，写道：执政者的腐败、欺压，是导致我国几乎“蹈于沦亡惨境”的深层原因。

毛泽东的这篇参赛作文，第一个“读者”是学校里的国文老师柳潜先生。他对这篇文章击节赞叹，随后署名“涤庵”，写了六则眉批，共有141字：“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　　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议论潇洒，积理宏富”；“力能扛顶”。一则尾批，共有65字：“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最后，柳潜先生给出了100分的成绩。并用浓墨在右上角写下了“传观”二字。号召全校学生传阅学习。

柳潜不愧为一位有眼光的教员。他从毛泽东的作文根基、思想、抱负，预见毛泽东是一位“伟大之器”，预测毛泽东将是一位有大出息的人。解放后，毛泽东曾经说，自己的新闻记者手笔是向柳涤庵老师学来的。

柳潜字钧湄，为湖南湘阴人，是清朝末年的一名举子。在湖南省一中，柳潜是首屈一指的国文老师。自从毛泽东以头榜进入省一中后，十分爱才的柳潜，便一直对这位“头名状元”特别“关照”。他除在课堂上对毛泽东严格要求、细心辅导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给毛泽东讲析历代文章大家的代表之作，毛泽东得到了系统而规范的古汉语言文字的训练。对于这次学校举行的作文比赛，柳潜把它看成是对毛泽东的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进行了充分的赛前准备。在参赛前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篇文章，然后交给柳潜批阅，请他提出修改意见。这样高强度、大难度的训练方法，使毛泽东的写作水平，特别是论说文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长进。他还曾借给毛泽东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鼓励毛泽东多读课外书籍。

毛泽东在接待美国记者斯诺时，提到了柳潜老师：“那时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录》（注：应是《御批通鉴辑览》）”，“我读了《御批通鉴辑录》以后，得出结论，不如自学更好”。随后，毛泽东来到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修半年，后考入第一师范开启了“恰同学少年”的学习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询问当年湖南高等学堂校长、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符定一，是否知道柳涤庵（柳潜）的下落。符定一回答：此人早已谢世，子孙后代情况不明。毛泽东深感遗憾地叹道：“可惜了。我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100分。”

2017.12.27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到了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要求徙木立信、以上率下，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央在此时使用“徙木立信”这个成语，正是为了表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八项规定要一直执行下去，给人民群众以信心。

少年多壮志——《七绝·咏蛙》

毛泽东1893年出生在韶山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小时候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他一读就是6年。他虽然熟读这些经典，但并不喜欢。虽不喜欢，但学习起来却也极为认真，这使得他从小打下了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后来毛泽东那些充满睿智的宏篇论著，还是那些大气磅礴的诗赋文章，都无不闪烁着民族文化的光辉。那时的毛泽东经常偷偷地阅读《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类书籍，书中的故事常常引起他深深的思考。像《水浒传》里聚集梁山造反的人物，是少年毛泽东心目中的大英雄，而且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水浒传》是一直陪伴毛泽东的书籍之一。书读的越多，毛泽东就越感到知识的匮乏，为此，他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歌，表达了对外面世界以及新知识的渴望：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圆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此时快成年的毛泽东决心一定走出家乡，走出封闭式的私塾学堂，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到那些新式学堂学些新知识。但是，讲求实用的父亲却不想让他在学堂里呆得太久，尤其是不喜欢他总读那些没有用的“闲书”，而是希望他到湘潭城里的一家米店去当学徒，学成后回来打理和继承家业。对此，毛泽东极力反对，因为他实在不想一辈子小富即安，永远做个井底之鱼。为了能继续求学，他几乎动用了所有的长辈、亲朋和好友去当他父亲的“说客”。父亲终于同意让他继续求学，到湘乡县立东山高小读书。从此，毛泽东离开了韶山冲，也开始了他一生最具传奇色彩的伟大人生。

1910年秋，未满17岁的毛泽东挑着行李，从家乡韶山冲步行20多公里来到东山学校求学。学校当时是一所新式的“洋学堂”，春季招生，而毛泽东入秋才来，错过了入学考试的时间，因此他进校门时就被守门人拦住。但毛泽东没有就此放弃，挑起行李径直往里闯。堂长（即校长）李元甫先生正好从此经过。他对毛泽东说：“如果你有真才实学就可以考虑录取你。”并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叫《言志》。守门人拿来文房四宝后，毛泽东立刻奋笔挥毫，直抒胸臆，一篇千多字的文章一气呵成。拿起文

章，李元甫先是被毛泽东一手工整的蝇头小楷所吸引，而看完全文后，更是被其中救国救民的热情和志气所感染，这完全不同于其他学生所写的光宗耀祖、升官发财这类的想法。李元甫由衷赞叹：“我们学校发现了一名救国才啊。”在他的极力争取下，毛泽东终于被学校破格录取。从此，这个从韶山冲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在东山学堂，毛泽东眼界大开。在这里，他感受到了老师们鲜明的爱国思想，接触到了自然科学和西学的一些新学科，学了一些外国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他第一次听说美国这个国家。当他听老师讲“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时，他说，“中国也要这样的人物”。在东山学堂学习的短暂日子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思想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那时到东山小学来读书的，多是些有钱人家的子弟。他们穿绸缎，着轻裘，入学时不是坐轿而来，就是有人护送。毛泽东穿着粗布大衫，很旧，口音难听，年龄很大才读小学，而且是外乡人。那些阔气的学生觉得他很“土气”，瞧不起他。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矮人一等，倒觉得比那些求官发财的学生和骄横傲慢的富家子弟高大得多。在感觉十分压抑的时候，毛泽东没有说任何话，自己跑到外边，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做《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树底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青蛙独自坐在池塘边上好像老虎蹲着，在绿荫树下休养精神，这“独坐池塘如虎踞”的青蛙正是此时少年意气风发的少年毛泽东。“绿荫树下养精神”道出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的情况。他争分夺秒地阅读了中外的历史、地理、社会科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边读边记边批，从中寻找救国之路和成才之道。他写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国文老师谭咏春阅后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字，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他常与同学老师们一起讨论时事，谈吐理想，抒发自己盼望祖国迅速富强起来的迫切心情，激励同学们为国家为民族而努力学习，将来多贡献力量。“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春天来到了，如果我不先叫唤，哪个虫儿敢发出叫声来呢!以此写出自己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

曾经少年多壮志，胸中常怀破天意。

从韶山到长沙再到上海，这个湖南韶山的乡里伢子一步步走出家乡登上世界的大舞台，他的成长不是偶然的，是来自时光、困难的千锤百炼方可造就。短短四句诗却

蕴藏这少年毛泽东内心磅礴激荡的理想信念，在看到当时岌岌可危的中国时，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座右铭，他借助青蛙虎踞池塘来抒发“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鸿鹄之志。毛泽东从来不怕压，不信邪，具有战胜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克服一切困难的过人胆略。

伟人之初：孩儿立志出乡关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离家时，写了一首七绝言志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毛泽东改写的诗作，原诗是日本江户时代月性和尚所作：“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这是一种仿造诗的创作手法，以前人诗词为基础，颠倒、删除、增添或改动几个字，将其从原诗中剥离出来，产生新意，这种诗叫剥体诗，也称剥皮诗、拟古诗。

《七绝·呈父亲》第一句便是“孩儿立志出乡关”，少年毛泽东为什么想要离开韶山？为什么要给父亲写这首诗呢？

毛泽东曾把自己在韶山的求学经历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02年春，毛泽东入南岸下屋场私塾读书，先读《三字经》，接着读《幼学琼林》、四书五经。他记忆力强，能够口诵心解，很快领悟。因为家境比较殷实，他先后读了六个私塾，学业没有耽搁，但他与父亲的期待有所不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让毛泽东读书，是为了将来能继承家业、承担劳动力，对儿子很严厉。毛泽东刚识字，毛顺生就要他学珠算，让他给家里记账，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他去做农活。毛泽东上学期间，白天要放牛拾粪，农忙时也要收割庄稼。到了晚上，一放下饭碗就可以回到上屋。这是他自己的小天地。毛泽东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点亮一盏桐油灯，反复阅读了《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中国旧小说和故事。他发现，这些故事里，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它们颂扬的都是统治者，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都是在欺压农民。这一判断，对毛泽东一生的历史观和是非观都有深远影响。

一天，私塾的老师毛宇居正在课堂上讲《论语》，毛泽东把《水浒全传》偷偷藏在《论语》的下面看起来。老师发现后，气愤地将毛泽东拉出教室，指天井为题要他赋诗，如果作不出就要打，还要告诉他的父亲。13岁的毛泽东望着被青砖严严实实围砌着的天井，知道天井里的积水不满一尺，里面有几条从溪中抓来的小鱼在水底的鹅卵石上撞来撞去……蓦地，觉得自己也像井中的小鱼。于是心中的诗句脱口而出.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圆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令人惊奇的并非诗的整齐和清纯，而是诗中强烈地流露出不甘做井中之鱼，要走出这个小小世界的意愿。

这种反叛心理，也折射到他和父亲的关系上。一次，毛顺生当众责骂毛泽东，毛泽东负气离开了家，父亲在后面追打。毛泽东跑到池塘边，恫吓父亲说再走近，他就要跳下池塘。父亲坚持要他磕头认错，而毛泽东则以跪一条腿认错。这使毛泽东意识到，如果公开反抗，父亲就会软下来。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不孝”，要算默默抗婚了。14岁那年，毛顺生给他包办了一个18岁的媳妇罗氏。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从未和她同居。

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看了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书中主张设议院、办商务、讲农学、兴学校。这本书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激起他恢复学业的愿望。

1910年4月，湖南粮荒，长沙饥民到湖南巡抚衙门示威，要求平粜救灾，他们冲进衙门，砍断旗杆，吓走巡抚。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正如《西行漫记》所记述：“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闭塞的韶山，紧张的父子关系，新思想的启蒙，求学的渴望，让毛泽东决定出乡关。

1910年，表兄文运昌告诉毛泽东，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西方新学，教学方法也很先进。他听了动心，想去那里就学。他先后请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劝说父亲。大家都说润之聪明好学，前途远大，到洋学堂可以学到比在米店赚更多钱的本领。父亲终于妥协，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的第一个重要转折。临行前，毛泽东思绪万千。一方面，独立不羁的性格使他急切地想要冲出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风气闭塞的山村；另一方面，想着要离开抚育自己的父母，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韶山冲，他多少有些依依不舍。于是，他写下《七绝·

呈父亲》，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七绝·呈父亲》是毛泽东感恩父亲的特殊方式。他把原诗的“男儿”改成“孩儿”，体现出对父子关系的准确定位，更体现出儿子对父亲的敬重。他把“死不还”改成“誓不还”，充分考虑父亲的忌讳和感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则准确表达毛泽东志在四方的坚定意志。当然，这毕竟不是自创作品，不能将每句话都看成是毛泽东的心志，尤其是“学不成名誓不还”一句。他外出求学显然不是为了求取功名，与其说表达毛泽东一心向学的志向，不如说这是为了让父亲高兴而作出的一种姿态。少年毛泽东以这种含蓄方式向父亲道别，比千言万语更精炼、更生动、更准确。从此，毛泽东义无反顾地走向外面的世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时光走过百年，青春之歌不曾褪色。

关于“新民学会”的研究，现已是一个热点问题。从论著方面来说，主要有唐振南、赵从玉主编的《风华正茂的岁月，新民学会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宋斐夫著的《新民学会》（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等等。这些论著基本上采用一种叙述性的方式对新民学会的建立、发展及性质、功能作用进行了一个总体的历史考察，着重于这种团体本身的整体研究。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学术论文对于新民学会的性质、地位，传统思想文化及新文化对学会的影响，新民学会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关系问题，新民学会会员的群体考察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可谓成果丰硕。但是所有的研究基础都离不开真实的史料。其中，由毛泽东撰写、编辑出版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就是现留存最珍贵的原始资料。

这本《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收录了从1918年6月至1921年1月期间，新民学会会员之间关于学会方针、留法勤工俭学等问题的讨论内容，共有三集。

第一集和第二集在1920年12月出版，第一集收录了从1918年6月至1920年11月会员间的13封信，介绍了新民学会发展初期的基本情况；第二集收录了从1920年3月至1920年11月的30封信，主要介绍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国内开展活动的情况；第三集于1921年1月出版，收录了1920年5月至1921年1月的7封信，主要是毛泽东与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关于社会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讨论。

见字如面；见信如晤。

这本承载着伟大理想与坚定信念的书信，不仅是研究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夏曦等会员在五四时期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极为重要的文献，同时也是研究新民学会这个团体最为权威的文献。

但是，这一珍贵文献被保存下来，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

那是1960年的一天，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学膺的办公室来了一位老朋友，这位老友向他出示了一本《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并告知王所长，他对这本文献非常珍视，因为这是在战乱年代保留下来的实属不易，告知文献的保存这其中还离不开另一位浏阳人——钟国陶。

钟国陶又名钟楚生，浏阳县人。1908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时称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编入本科第1部第1班，1913年12月毕业。后又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曾任长沙周南女校教员、周南小学主事、第一师范附小主任教员。1918 年，与徐特立、朱剑凡、陈润霖等教有界人士发起组织“健学会”，传播研究新文化，毛泽东誉为“东方的曙光”、“空谷足音”。1919 年投身五四运动，加入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的新民学会，一直从事教育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还在日寇大举犯湘之时，他回到浏阳老家，发现当年会员人手一册的“会务报告”除封面缺损外，正文完好，遂加装封面，并作题志道：

“此册系毛泽东同学所手编，学会亦其所领导，亦即中共毛主席青年生活一断片。余于国乡，家物尽失，独此册无恙，惊喜若狂，急为整理保存，以为纪念云。国共合作抗日第八年八月中楚笙识”

他在“整理”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在“会务报告”的若干处，用墨笔对原文作了个别文字修改。此后，他一直珍藏着。《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就收录在这本会务报告中。1959年，湖南人民政府号召搜集革命史资料，编写革命回忆录。钟国陶把第一号记载着学会从1917年冬发起至1920年冬的主要活动，计8500余字；第二号翔实记载着1921年新年大会一月常会上各会员的发言，计16900余字，两共25000余字的“会务报告”送交浏阳县志办公室。这就是前面王学膺所长收到的文献。

而王学膺在历史考古所后分管科研，他一贯重视搜集历史文献资料，对“会务报告”事，他知道这一文献的重要性，就决不轻易放弃收集这一文献的机会。于是在征得同意后，拍摄了“会务报告”第二号的1、2、3、15、16页，这里面含有毛泽东在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的发言。并教他爱人、历史考古所资料员李玉将两号报告全文抄录一份。他交代“必须按照原有格式抄录，例如从右至左，直书，每页十二行，每行首尾各是什么字，都要与原铅印件一致。”李问为什么，他说“必要时，重新排版，就可复原。”李抄完后，他逐字逐句仔细校对，凡是修改过的地方，他都在页下作注。这样的注释共有六处，现列举如下：

一、在“会务报告”第一号封面页下注道“原缺封面书题、刊期，都是钟楚笙写的。二、“会务报告”第二号第34页第三行，毛润之在发言时说“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最痛苦的牺牲。王注道“，（）墨笔加的。”三、第35页八至九行，墨笔改为“每天做四小时工”王注道“原为‘四做’。四、第40页倒数第二行原文是“各地会友均能同样举行……当得到种种益处。”王对“均”字作注

说“墨笔改作‘若’。”对“当得”二字作注说“‘当得’，墨笔改作‘当可得’。五、第44页倒数第二行，毛润之发言的第一句话原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王对“可”字作注说“原作‘可’墨笔改‘所’。六、第47页五至六行有如下语句“毛润之不赞成熊瑾汀于体内应之消费主张，谓生活奢’不特无益，而日有害，主张依科学的指导，以适合须的养料”其中有两个片语文字不通钟国陶作了订正，他把‘于体内应”四字，钩画到‘以适合”三字后面。这祥，纠正了排版上串行的错误，使文字畅达，语意清晰。王在抄本上照样钩画，并注释说“墨笔改”。

这六条注释，寥寥余字，但它雄辩地证明，“抄件”是完全准确可靠的。钟国陶1961年逝世后，他精心保存四十年的“会务报告”不久遗失，在此情况下，王学膺所长指导抄录并校对作注的“抄件”也就成了传世珍本，现在市面所看到都是抄录本翻印的。

在匆匆远去的时光里，一些人会渐行渐远，一些事情会被淡忘。《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这本曾经寄托了纯挚友情的书信、这本承载了理想与信念的书信，却像一座座闪光的精神丰碑，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永远启迪着后人。

一封托孤信

1982年，在翻修板仓杨开慧故居的时候，人们从墙缝中意外发现了杨开慧的7份手稿。这四千多字的手稿，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侵蚀已经泛黄、斑驳，但这样一位伟大女性的家国情怀却更加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肃然起敬。这其中有一封托孤信格外让人动容。信中，杨开慧这样写到：

一弟：

……

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倘若真的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

杨开慧
1929年3月

写这封信时，杨开慧只有28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毛岸英只有7岁，小儿子岸龙还不足3岁。究竟是怎样的境况，让年纪轻轻的她写下这样的一封信呢？

杨开慧与毛泽东少年相识，基于共同的革命理想结为伴侣。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位女党员，她勇敢坚毅；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她贤淑温良；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温柔慈爱。

在风起云涌革命形势下，毛泽东四处奔走，与妻儿聚少离多，杨开慧总是毫无怨言地支持着毛泽东。1927年8月31日，杨开慧再次在夜色中目送毛泽东渐行渐远，或许两人都未曾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别。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毛泽东奔赴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之后率领队伍上了井冈山。重山阻隔，加上敌人的封锁，杨开慧与毛泽东失去联系，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板仓坚持斗争。就在写下这封信的前几个月，她从报上得知：朱德的妻子伍若兰枭首示众，她的挚友向警予在赴刑场的路上依然遭受酷刑，她的闺蜜郑家奕被捕后

被折磨得无法行走，敌人用箩筐将她抬到刑场，乱枪点射而死。同为革命者，她知道死神随时可能降临。面对牺牲，她无所畏惧。但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面对三个年幼的孩子，她辗转反侧过多少不眠之夜，又流淌过多少眷念的眼泪。母爱与信仰，生存与死亡曾怎样的考验着这位年轻的母亲？于是，她把对孩子的不舍与牵挂凝聚在笔端，给堂弟杨开明写下了这封托孤信。可信还未寄出，杨开明却先她而牺牲了。这封信只能被她深藏在老屋的墙缝里。

一年后，杨开慧不幸被捕入狱，大儿子毛岸英和她一同被捕。在狱中，她受尽折磨，宁死不屈。无计可施的敌人最后引诱她，如果发表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带着孩子获得自由。但杨开慧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在她的心里，“毛泽东”不仅仅是她的丈夫，更代表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份她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信仰！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带着“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的坚定信念英勇就义，年仅29岁。

杨开慧牺牲后不久，她的三个孩子不幸流落上海街头。毛岸青惨遭军警毒打，留下终生无法愈合的创伤；毛岸龙失踪，从此下落不明。20年后，长子毛岸英也和她一样追随自己的信仰，牺牲在朝鲜战场。这些狂风骤雨，杨开慧怎么会没有想到呢？可牺牲我小，成功我大！为了天底下所有的孩子，杨开慧做出了一个母亲、一个共产党人最伟大的选择！

今天，当我们再次阅读这封托孤信，我们不仅读到了一位母亲的柔情，更读到了一名共产党员舍小家、为大家的政治本色。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征程中，正是无数共产党人带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构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精神城墙。今天，更需要我们接过先辈的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与天奋斗 “奋斗”诗

诗作：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917年毛泽东

释义：

这首诗出自毛泽东1917年写的《奋斗自勉》，意思是与天地共同奋斗，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志们一起奋斗，遵循自然规律，天人合一共同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奋斗的真意，以及奋斗过程中的无穷快乐！

正文：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创作了不少优秀诗歌，其中有一首 “奋斗”诗内容如下：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首曾激励无数人的“奋斗”诗，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篡改原意，用来挑起群众斗群众，给一些人理解这首诗的真正含义打上了偏见的烙印。其实，这是一首充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豪情，集中反映毛泽东学生时代救国救民思想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意气的优秀诗篇。

透过历史的眼眸 ，站在岁月的肩膀上远眺，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伟人毛泽东是如何在拼搏进取、自我奋斗中实现自我价值，成就辉煌人生。

他在救国救民的爱国信念中自我奋斗。

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古往今来，无数知识分子、爱国人士为其抛头颅、洒热血，那份珍贵的历史责任感，自古以来同时也是潇湘热土的传统品德。

青年毛泽东成长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数万中华儿女处于水深火热的阶段。从小，毛泽东就耳濡目染，见到了遍地饿殍、军阀混战、长沙饥民暴动等等骇人听闻的惨痛民族灾难。这些都对少年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那个闭塞的韶山冲里，当他第一次读到了那些痛心疾首的爱国主义色彩浓重的小册子后，他的内心如同被一柄

石锤重重击中，震动不已。那些痛心疾首、呼唤民众的新思想文化书籍，让他第一次萌生了要走出家乡去救国救民。多年后，毛泽东还曾感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救国救民的种子就此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忧国忧民的情怀至此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怀揣强烈的爱国之心，沉重的救国救民之感，毛泽东苦苦寻找适宜于中华民族数万万苦难民众的救国办法。当他第一次离开韶山，给父亲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来表达自己的坚定救国信念。透过诗词，我们能够感到青年毛泽东伟大的理想抱负以及他那坚定不移的意志决心。

在看过《世界豪杰传》时，他曾感叹道：“中华民族理应有如此人物，我们应当投身于富国强兵之道，才不会落入越南,朝鲜,印度曾走过的错误道路，并且全民族人民都要一齐努力。”所有的这些都表明，毛泽东的救国救民思想以及对祖国的真挚情感自少年时期可见一斑。正是因为从小坚定不移的伟大理想抱负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让毛泽东刻苦奋进，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解放。

他在刻苦勤奋的学习态度中自我奋斗。

青年毛泽东学习的刻苦程度众人皆知，出众的学习方法更是集百家所长。在学生时期，自“孩儿励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转变为“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最后的“改造中国与世界”。通过刻苦勤奋的学习，始终坚定不移追寻真理，并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期间，特别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后，他读书不倦，学而不厌。晚上学校规定的自修时间短了，他就在寝室继续学：学校吹号熄灯了，他就到不熄灯的走廊上看书。他曾自备一盏灯，下面用一只竹筒垫起，坐在床上看书，看得有趣时，他可以通宵不睡。他特别珍惜时光，一天到晚都有合理的安排。早晨天蒙蒙亮他就起床，进行冷水浴,做体　。運動1小时后,就读英语;午前8时至午后了时上课堂;4时至晚餐读国文;晚餐后至学校明灯自修前，邀请同学好友散步、谈心，讨论学习与时事、社会改造等问题;明灯自修时至媳灯 前，温习各门功课熄灯以后,再作1小时运动。这就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五段课程，他有一套完整的自修计划。对于老师讲得不深透，或自已没有弄懂、存有疑问的地方，他常当即发问。

学海无涯苦作舟。青年毛泽东勤奋刻苦地学习目的很明确，只有对自己不断提升，让自身的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如同奔涌的河水一般源源不绝，那么就需要想尽办法利用一切时间刻苦学习，提升自己。

他在坚韧顽强的意志品质中自我奋斗。

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对自身意志力的锻炼贯穿始终，这样为他后来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湖南一师，他曾经专门来到长沙旧城门口，在喧闹嘈杂的环境中读书锻炼自己，锻炼自己注意力集中的意志品质。除此之外，为了提升自己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对于饥饿、寒冷等艰苦环境的耐受力，毛泽东在数九寒冬每天早晨坚持洗冷水澡，整整四年从未有一天轻言放弃。另外，毛泽东还曾经在水位暴涨的湘江中搏浪弄潮，还曾经在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时登岳麓山锻炼自己的胆量。还曾联系同学开展集体活动，通过徒步野外、求生考验等多种方式提升自己的综合水平，以艰苦环境中自我的顽强意志为准则对自我严格要求。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今天，当代青年所面对的社会背景较青年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而言其变化早已翻天覆地。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对当代青年产生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强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学子寄予厚望。他指出，新时代是年轻人的时代，当代青年一代是与新时代同行的一代，要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担在肩上。寄语青年人忠于祖国不负时代，勉励青年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放飞青春梦想。因此，在新时代下青少年应坚持与发展青年毛泽东自我奋斗精神，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战以图存
——毛泽东1916年7月25日写给萧子升的信

1936年，第一个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蜚声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详细记录了毛泽东在窑洞中与他谈话时观天下之变、谋时代大势、指未来之路的雄韬伟略，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等一系列精辟的论断，让斯诺由衷地称赞毛泽东为“窑洞里的预言家”、“红色预言家”。而斯诺所不知道的是，关于中日之战，毛泽东早在20年前的学生时代就有过一次精准的预言。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卷入战争，无力东顾之机，加紧扩大侵略中国。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恢复帝制的支持，竟然屈从了这一“亡国条约”。此事在当时的第一师范激起了轩然大波，进步师生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毛泽东在书的封面上愤笔写下十六字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抒发一个22岁的青年学子抵抗日本、救国图存的坚定决心。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班挚友易永畦病逝，第一师范学友会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在悼亡诗中写道：“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诗中既有对亡友的追念，更表达了对日本和沙皇俄国侵略中国这一时局的忧心如焚。

此时的毛泽东极为关注时事，虽然手头拮据，但是总是想方设法地购买或借阅当时发行的各类时政报刊。第一师范校方也非常注重引导学生对国事、天下事的关心，专门设置了一件阅报室，及时更新《大公报》《新闻报》供学生浏览。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一师读书期间，包括学费在内，他一共用了160元钱。“在这个数目里面”，有三分之一是用在了订报上——“每月约需一元”。此外，他“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他“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

当时欧洲在打世界大战，国内在上演复辟丑剧和军阀混战，局势变化多端。对此，人们困惑不解，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毛泽东却能把局势分析得清清楚楚，据他的好友萧三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哪些国家打得好，为什么打得好；哪些国家打得不好，为什么打得不好；哪些国家会胜利；哪些国家会失败，为什么会失败”，“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毛泽东天天看报，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和世界，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

1916年7月，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日俄在彼得格勒签订了一个密约，明目张胆地提出要结为军事同盟，共同保障所谓在中国的“合法权益”。这一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赤裸裸侵犯的举动，当时基本上没有国人注意，却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更让毛泽东忧心忡忡的是，报纸上还报道了一则消息——炮制了“二十一条”的日本大隈内阁即将重组。当时一部分国人对新任日本内阁抱有一定的幻想，认为中日关系将有所缓和。综合这些时事新闻，毛泽东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忧虑，提笔给好友萧子升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他写道：

“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撄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

“日人诚我国劲敌”，这是毛泽东综合历史的教训和当下的国际国内形势，以见叶知秋的敏锐形成的一个客观认知。他透过日俄协约这一现象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正在步步深入，其目的就是要吞并全中国，称霸亚洲。

为什么日本一个小小的岛国，人数远远没有中国多，会成为中国的劲敌呢？毛泽东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也就是说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处在酣睡而不清醒的状态，国大而无组织力，人多而无凝聚力，且对日本知之甚少，毫无防备之心；而日本不仅对中国已经了如指掌，同时想吞并中国的企图已经蓄谋已久，正步步为营。

毛泽东联想到杨昌济老师在课堂上，曾数次讲到日本帝国主义1894年侵略中国、朝鲜以及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的勾结，并以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教育学生，这些教诲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到这么多年来中国对日本的一再退让，不仅不能满足日本的贪欲，更助长了他们长驱直入的嚣张气焰。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但毛泽东以超凡的洞察力和缜密的分析研判，做出了“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预测。

那中国人该怎么做呢？毛泽东随后提出“要注意东事”，“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的主张。他认为一定要注意观察日本，研究日本，要改变毫无防范的被动挨打的状态，年轻一代一定要清醒地拿起手中剑，把它磨成锋利之剑，只要中国拿出敢战的精神，日本侵略者就不会得逞。

这封信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青年毛泽东虽身无分文，但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这封信的落款时间为1916年7月25日，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历史惊人地证明了毛泽东“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的这一预言。毛泽东的这则预言决不是臆测，更不是巧合，这是一个23岁的青年学子以强烈的责任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吹响的集结号，发出的时代最强音。

《送纵宇一郎之东行》赏析

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与其卓越的军事、政治、思想成就一样让世人敬仰的还有他的诗词佳作。毛泽东的诗词作品是他波澜壮阔的奋斗生涯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的壮丽史诗，其最大的艺术特点可以概括为气势恢宏、瑰丽浪漫。《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七律·长征》、《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都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点。毛泽东诗作当中的“浪漫”这一特点在他求学时期的诗作——《送纵宇一郎之东行》中就有体现。

一、解读

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世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赢濯剑有书还，我反自崖君去矣！

该诗是毛泽东1918年夏为即将远赴日本留学的好友罗章龙送行时所写的。这是他学生时代的最后一首诗，也是他早期诗作中唯一公开发表过的一首，1993年9月人民文学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一书中将该诗收入副编(2)。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和《椿园诗草》等书中对这首诗有过详细记述。

在这首送别诗中，毛泽东表达了对即将“东行”的好友的美好祝愿，也抒发了他纵横寰宇的恢宏气概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向，为毛泽东早期诗作中的成熟、上佳之作。全诗可分四段：

第一段为前两句，从“衡岳”下笔，用“天马”、“凤凰”、“春树”和“屈贾才”等鲜明的地域和文化字眼，既点明了为罗章龙送行的地点是在长沙，又通过这些湖湘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渲染了“惟楚有才”、人杰地灵的历史文化氛围，激励即将东行的友人谨记湖湘学子的傲骨和才情，无愧于桑梓和时代。

第二段为第三句至第五句。将友人比作“鲲鹏”，同时再辅以“洞庭”、“湘

水”、“直东指”等波澜壮阔的词汇，真挚地祝愿友人前程远大。“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一句更是寄寓友人此次东行天时、地利、人和，表达了对友人的美好祝愿，细腻的安抚了友人远行前的焦虑与不安。

第三段为第六句至第九句，这一段临别赠言是全诗的重点，是诗人将自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向与友人砥砺共勉的赤子丹心。“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　米”反映了诗人的纵横寰宇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是诗人对待世事时局清醒、冷峻的态度；“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表达了诗人希望挚友注意个人修养，修身、齐家方可治国、平天下的美好期许；“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则为劝勉友人多做有利于“国与群”之事。

第四段为最后两句，诗人巧妙地将当时送别地长沙的“平浪宫”、途径上海的“崇明”、到达日本的“对马”等三个地名用“衣带水”予以贯穿，突出送别的“友谊多”；用“东赢濯剑有书还”一句与友人约定别后多联系，多交流；末句引用《庄子》“送君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运矣”的名语表达了与友人依依不舍的深厚情谊，抒情渲景，妙笔生花。

二、赏析

该诗是一首非常典型的送别诗，诗中表达了毛泽东对友人浓郁的送别之情，但又没有丝毫的离别之殇，相反大量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的运用，使得全诗充满了博大开阔的意境和瑰丽的浪漫主义色彩，是一首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诗作。

毛泽东早期的诗词作品因为受到私塾教育的影响，多数以身边熟悉的事物为题材，注重写实，创作方法上偏重于现实主义。而该诗在紧扣离别这一现实主题的基础上，第一次创造性的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写作方法，是毛泽东诗词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手法的开端。

说到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不得不提到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的代表作《离骚》、《九歌》、《天问》等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尊为“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对后世影响极大。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极其崇拜屈原，现存的毛泽东当年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的前11页为其工整抄录的《离骚》和《九歌》。解放后，毛泽东还多次推荐他身边的人学习《楚辞》，还将屈原思想性与艺术性俱高的作品作为国礼赠送外宾。毛泽东的诗词受屈原诗词的影响也非常大，如1961年他写的《七律・答友人》中的前四句：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源自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

在这首《送纵宇一郎之东行》中，毛泽东以一句“年少峥嵘屈贾才”表达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追随和仰慕，“君行吾为浩歌”中“浩歌”则语出屈原《九歌・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兮浩歌”。由此可见，屈原的思想和人格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屈原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正好吻合毛泽东的审美情趣和对艺术风格的追求，由此逐渐影响、形成了他瑰丽浪漫的诗词创作特色。该诗作为毛泽东最早的尝试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作品，在艺术创作上具备如下特点：

（一）、意象美

意象是指构成形象的事物的表象，在文学创作中也称“审美意象”，意象在文学创作中可以丰富作品的意蕴，提升作品的意境，加深作品的意味。(3)浪漫主义诗歌中的意象往往是诗人主观想象中的事物，通过运用一些记忆表象来象征、比喻所描写的对象。如要表达一个人的高风亮节通常用“梅”、“竹”为意象，清风廉洁则用“莲”为意象等等。

在这首诗中，毛泽东选择了大量美轮美奂的历史、神话和传说中的意象来烘托送别的情景和诗人的心境。如“天马凤凰春树里”一句中“天马”、“凤凰”都是古代传说的灵异动物，古人认为它们的出现将预示圣贤的降世，同时“天马”和“凤凰”又是指送别所在地的两座山名。而“春树”即椿树，《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因此“椿树”通常在文学作品中象征古老又充满青春活力的树林。这一句寥寥七字，因为使用大量的意象而烘托了博大开阔的意境和情怀。另外“年少峥嵘屈贾才”中的“屈原”、“贾谊”，“鲲鹏击浪从兹始”中的“鲲鹏”等都是作者独具匠心的意象运用，表达了诗人对挚友的美好祝福。

诗中还包含很多诗人从客观实际中提练出来的意象，如“洞庭”、“对马”、“稊米”等，这些都不是诗人“眼前目睹”的事物，而是诗人根据抒发主观思想和感情需要，运用自己丰富的联想和奇伟的想象提练和创造出来的意象，从而营造出了纵横天地间的广阔意境。

（二）、典故精

典故是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可以增大诗词的表现力，

在有限的词语中展现更为丰富的内涵，可以增加韵味和情趣，也可以使诗词委婉含蓄，避免平铺直叙。

在这首诗中，毛泽东几乎句句引用了典故，如“胸中日月常新美”一句语出屈原《涉江》中“与日月兮齐光”，《史记·屈原列传》颂赞屈原“与日月齐光可也”，宋代黄庭坚说“古人之学问高明，胸中如日月”。诗人巧妙的引用了这一典故，并且创造性的改鉴为“胸中日月”，不仅仅是表达了对先哲的敬仰，同时更为真切的表达自己“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恢宏志向和坚定决心。又如“洞庭湘水涨连天”、“东瀛濯剑”、“我反自崖”等等，都各自有内容丰富的典故，从而使得全诗具有浓郁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表现力。

（三）、夸张奇

夸张是诗词创作中经常运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它是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夸大或缩小事物形象或某种性质、程度，借以突出事物的某种特征，抒发作者某种强烈情感的修辞方式。(5)毛泽东在这首诗中多处运用了绮丽的夸张手法，其中最经典的一例为“要将宇宙看　米”，这里毛泽东将“宇宙”夸张地缩小成“　米”，强烈的对比抒发了诗人气势如虹的理想志向。又如“崇明对马衣带水”一句中将上海的崇明与相隔几千里的日本对马说成“衣带水”，这与王勃的“天涯若比邻”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诗通过运用这些强烈的夸张手法，一扫离别诗惯有的悲情，赋予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氛围和思想境界，也使得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由现实主义逐步发展到了浪漫主义阶段，并初步具备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四）、哲理深

但凡出众的诗词佳作，不仅词韵和意境考究，同时往往揭示了发人深省的人世哲理，使之成为千古名句。如屈原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范仲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是其中的典范。

毛泽东在这首诗中的最大亮点也在于提炼了一系列启人心智的哲理名句。如“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沧海横流”与“安足虑”形成强烈的对比，鲜明地折射出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思想历练过程。毛泽东少年时期就十分忧国忧民，17岁那年深感“国家危亡”，不能“安心耕田”，决心走出乡关，出外求学。随着学问的增长，意识的提升，毛泽东对于时局的把控由最初的“忧虑”逐步转化成“无忧”，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说：“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仍知不然，

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无忧也”。这深刻地反映了诗人这一时期思想上产生的飞跃，发现了“民质”在“社会”中的力量，提出了“改建政体”的宏伟蓝图。同时，毛泽东也在诗中勉励学友无论世事如何纷纭变幻，作为中流砥柱的年轻一代只要树立远大志向，从自我做起，“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一定可以“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与他后来在《沁园春·长沙》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以及《沁园春·雪》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一脉相承的气概与担当。

另外“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一句在这首诗中也堪称点睛之笔。毛泽东酷爱研究历史，他纵观历史上一切昏君庸臣无不是管却不了“自家身与心”，让一己私欲覆盖于民生社稷之上所致。这一句不仅是毛泽东对学友的勉励，更是他对自我的警醒。这种警句穿越岁月的风烟，直至今天仍然是震耳欲聋，发人深省的。

1918年，对于毛泽东而言是极具意义的年份。他结束了“年少峥嵘屈贾才”的求学生涯，带着“鲲鹏击浪从兹始”的豪迈气概大步踏入社会变革的滚滚洪流。此时的毛泽东逐渐褪去了“书生意气”，以“要将宇宙看　米”的雄伟姿态傲立于建党革命的潮头。自古诗以言心志，毛泽东站在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前，他的笔触不再局限于“眼见耳闻”的现实主义题材和创作手法，他的诗词创作从这时开始如同他传奇的人生一般呈现出气势磅礴、瑰丽浪漫的鲜明特色。《送纵宇一郎之东行》是毛泽东诗词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开端，为日后其日臻形成的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人研究、学习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诗词创作、思想脉络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真理的曙光

——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

一封信，让阅信人拍案称赞：大有见地，非庸碌者……不愧为大器量之人！

一封信，见证了一个年轻人探求解决中国问题大本大源之道的心路历程，犹如黎明前的曙光，指引其在后来的学习工作和革命实践中，确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这就是1917年8月23日，24岁的毛泽东写给老师兼好友黎锦熙先生的一封长信。此时的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最后一年的学习即将开始，刚结束38天的农村社会调查回校的他，回想这一路走来亲眼所见的民生多艰、社会激荡，想大展身手但又苦于找不到方向的毛泽东，将自己建立在所见所闻基础上关于时局的所思所想尽情倾注笔端，一个“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蓝图在他的字里行间孕育升腾。其中他这样写到：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

细读这些文字，怪不得当年黎锦熙先生拍案叫绝。在这封信中，一个心无分文的在校师范生，不仅气势如虹地提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的主张，更切中要害地指出当时中国的病根就是“俱从枝节入手，”而“本源未得”，目光如炬地提出探求“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才是求得中国根本改变的良方。

毛泽东如此“激扬文字”绝非图一时口舌之快的狂妄之词，而是对当时时局的痛心疾首和冷静分析。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各种政治势力、思想文化“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乱局面。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然而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也没能改变旧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军阀政客，“胸中茫然无有”，“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只剩“手腕智计”，各种思想和举措无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没有抓住病根，无补于中国世事。

问题找到了，怎样对症下药呢？他一语中的地主张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只有这样“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才能“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才能从根本上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大本大源”并非毛泽东首创，而是浸润毛泽东成长的湖湘文化中的思想精髓。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哲学思考，到北宋周敦颐开启宋明理学的源头；从南宋初胡宏、张　“卒开湖湘之学统”，到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王船山创立空前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再从大思想家魏源创作哲学著作《默觚》，到中国近代改革“第一烈士”谭嗣同创立“仁学”……湖南历代知识分子在立志救国救民之始，总是力图首先从宏观总体上把握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规律，作为自己的最高信仰和治国平天下的指导原则。

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又有幸得到杨昌济先生的指导，如饥似渴地读了《伦理学原理》《西方伦理学史》等著作后，更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探索宇宙、社会、人生“大本大源”的哲理思考的强烈兴趣。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虽已认识到探求“大本大源”的重要性，却苦于找不到“大本大源”本身而彷徨。正如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向老师坦诚所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在何为立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当时大多数读书人的思考大相径庭，他认为离开真理谈立志，比如读书的目的就是设想将来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这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他认为作为一个年轻人，求学应“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盍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因此，才有了当1915年袁世凯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毛泽东在《明耻篇》上的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才有了1916年毛泽东7月23日致友人信中的精准预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我辈只有磨砺以待日本。

循着这样的历史逻辑，毛泽东修远求索寻觅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滞。

1918年夏，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在杨昌济先生引荐下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在这里，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犹如一道暗夜中的曙光，为艰难求索的毛泽东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解放中华民族“最好的武器”。他在历经了新村试验、湖南自治运动等种种试验后，深刻认识到“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趋附”。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苦苦求索的真理。而毛泽东“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从“大本大源”的上下求索，到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青年毛泽东完成了由一个进步学生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并执着致信，终生不渝。这一真理犹如壮丽的日出，不仅照亮了青年毛泽东修远求索立初心的奋斗历程，更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中国共产党用百年奋斗的辉煌成就为“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提供了中国答案。

征友启示

五四运动前夜的近代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这一切使人迷惘，但又迫使新一代的先进分子不得不重新考虑天下国家之大计和个人的立身处世之道等问题。这一群体中就包括毛泽东和他的同学、朋友们。

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前后共做了五年半的师范生。当时湖南第一师范在校长孔昭绶主政下，“采最新民本主义规定教育方针”，以“人格教育、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惟一之宗旨”，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周世钊、萧三等。他们纷纷聚集在堪称培养新青年摇篮的湖南第一师范。同时也是为了更多寻求到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为国捐驱的有志之士做朋友，毛泽东在1915年的秋天，他向长沙各学校张贴了这样一份“征友启示”：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艺学子。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启事用八裁湘纸油印，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为兰亭帖体。

征友启示的大意为：今日祖国正处在危机存亡之时，特邀请有志爱国的青年组织团体，砥砺品行，共同寻求救国之道。启事以《诗经》上的“嘤其鸣矣，求其声友”为结尾句，表示“求友之心甚炽”。在启示的最后还备注着转交第一师范附小陈章甫，落款署名为“二十八画生”。

这种少见的举动，在当时可是引起了大家的议论纷纷，随即在长沙各校也是传开了，有不少思想保守的人认为这“二十八画生”是一个神经病，有伤风俗，把“征友启示”都给撤掉撕毁。还有的人认为这是哪个富家公子为了为了掩人耳目找女朋友才张贴出来的。当时湖南女子师范的马校长本就在学校禁止同学们与男校的学校交往，出了这事，他更是提防着，还找到一师附小的陈章甫兴师问罪，询问这“二十八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先生，你怎么帮人做起找朋友、当媒婆的事情来了！找朋友找到我们女子师范来了。这‘二十八画生’是什么人？”

陈章甫得知情况后，笑道：“马校长，你误会了。”并且解释道：“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是“毛泽东”三个字繁体的笔画，一共二十八画，同时还不忘夸赞

毛泽东是一个品学兼优、德才兼备又有远大志向的有为青年。

马校长对陈章甫的话将信将疑，后由找到第一师范校长武绍程核实情况，武校长也是对毛泽东赞不绝口，才意识到错怪了这位“二十八画生”：“这是一位救国人才，有志气，有理想，可钦可畏！”对这位后生晚辈也是有了一丝敬意。

最后，通过这份征友启示，毛泽东一共是征得三个半人，根据史料记载，毛泽东一共约见了几位响应的人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使馆见面。他们见面时，不说一句客套话，开口就问：“你近来读些什么书？写了些什么文章？”其中，毛泽东和罗章龙会面时，整整谈了3个多小时，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分别时毛泽东还不忘对罗章龙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常见面。

“征友”事件后的两年半，由开始的几个人到后来的几十个人响应，在毛泽东的周围逐渐云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青年，这些进步青年后来在1918年4月14日在岳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中组织成立了后来被誉为“建党先声”的新民学会，共同踏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自信人生二百年《七古·残句》

诗作：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1917年毛泽东的《七古·残句》

释义：

《七古·残句》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在湘江畅游时吟咏的。大意是我相信人生会有二百年，那自然要游泳击水三千里。抒发了不畏艰难、奋发图强的豪情壮志。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批注道：“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正文：

关于毛泽东“游泳”的诗作，您会想到哪首？

是“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意境雄阔的《浪淘沙·北戴河》？

还是“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中遒劲有力，放眼天堑，豪情壮志的《水调歌头·游泳》？

甚至更早的“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中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搏击风浪的《沁园春·长沙》？

……

的确，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关于游泳，他写下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这首《七古·残句》就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首。

说其特别是因为它不完整，没有全文，但仅有这二句也足够了。这二句诗也是平日引用极广，特别是当我们想鼓舞自己的信心、继续奋斗之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念出

这二句诗。毛泽东自己也是始终记着这一联，并多次谈起，可见他对描写自己自信、豪迈性格的这一联是很喜欢的。

有人说“没有坚定的意志与强烈的自信，任何人都不能成为重要的领袖人物。”的确，这方面，毛泽东是无可挑剔的，他少年时就显示出独立自主、敢想、敢做、敢为的品质和强烈的自尊自信。特别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他得到了一大批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老师们的精心指导和悉心栽培；同时，也结实了一大批跟他一样胸怀救国救民远大抱负的青年朋友，这些都为他日后的“自信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7 年5月4日，毛泽东的同窗好友罗学瓒在日记中记载：“近数星期来，每天下午与同学远游三四里处,或临山，或眺水，或漫谈，觉心志愉快异常，真有大益处。”他们几乎天天以游泳、爬山等方式在集会讨论中修身、立志、求真理。

都说“智者乐水”，在众多的聚会方式中，毛泽东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最喜爱还是游冰。1917年，他与好友陈绍休以学友会游泳部名义为号召，组织了近 80人的游泳队，每星期至少游泳一次。橘子洲头,河水清澈见底,由浅入深，是天然的游泳场。洲上还有青翠茂盛的桂树、樟树，鲜艳的芙蓉花，供游泳者休息时欣赏，毛泽东和朋友们游泳后经常在沙滩上行日光浴，或在桔园里漫谈。

在月明星稀的夜晚,他们也常驾驶木帆船围绕橘子洲,畅游湘江。

1917 年中秋节，毛泽东邀请罗学瓒、张昆弟、邹蕴珍、周世钊、李维汉、蔡和森等16人,租用木船两只，环绕水陆洲游览了一圈。接着,席地坐在橘子洲头的草地里，漫谈“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贫弱局面，一介师范生的他自信将来掌握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使命会由他们这一代人去承担，讨论热烈非凡，清风明月，不知不觉已过二更，大家还不愿散会。

这种聚会,给毛泽东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193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对斯诺说：这是一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正是描绘在一师求学时，这一批生气勃勃、目

标远大、意志坚定、蒸蒸向上的青年。后来，他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大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从1910年至1921年，青年毛泽东十年磨一剑，历尽艰辛，矢志不移，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共产主义，并用一生的努力奋斗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今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但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坚定自信和超人意志的中国青年接续奋斗。正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大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已住，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得气、底气，不久时代，不负年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如何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100年前青年毛泽东的自信人生和奋斗历程堪为表率。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1903